

陆安史志

2021年 第3期  
总第37期

# 临安史志

## LinAn Historical Records

### 目录

#### · 卷首 ·

袁家军:以守好红色根脉的担当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1

#### · 史海钩沉 ·

在新登战役纪念会上的讲话 ..... 粟戎生 6

共产党员的风骨与情怀——在“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巡回展(第七站)”上的讲话 ..... 王苏炎 11

浅谈衣锦城与衣锦街的历史 ..... 许锦光 16

“当代梁山的阮氏兄弟”——阮迪民革命生涯纪实(三) ..... 卞初阳 20

钱惟演与《西昆酬唱集》 ..... 顾彭荣 26

石樵与民国时期的《於潜县志》 ..... 郑明曙 32

#### · 史志理论 ·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 区委党史研究室 36

浅谈修志资料的收集——以二轮《萧山市志》经济部类编写为例 ..... 金雄波 38

从“七一”重要讲话中汲取开创未来的奋进力量 ..... 颜 林 46

#### · 天目骄子 ·

我的战斗历程 ..... 姜世殿 49

永远是战士 ..... 刘学德 58

#### · 红色胜迹 ·

侯头之战纪念碑 ..... 64

来学照烈士纪念碑 ..... 65

主 办: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杭州市临安区地方志研究室

主 编:方英儿

副 主 编:王飞熊 许月琴 刘金炎

责任编辑:庄雪君

编 辑:彭 铖 许锦光 李 湘

林岩生烈士墓 .....	66
龙井桥革命烈士纪念碑 .....	67
龙上新四军驻军旧址 .....	68
民族日报社旧址 .....	69
藻溪革命烈士纪念碑 .....	70
赵尔春烈士纪念馆(纪念碑) .....	71
周恩来演讲旧址 .....	72
邹子侃烈士墓 .....	73

· 吴越走笔 ·

1967,大旱之年的乡村 .....	杨菊三 74
永远的井冈山 .....	陈利生 76

· 工作动态 ·

区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开展“七一”慰问困难老党员活动 .....	79
区委党史研究室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会 .....	80
区委党史研究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	81

封一:高虹新四军纪念馆 俞海

封二:今天,如您所愿 俞海

封三:传承红色基因 续写时代篇章 曹莹莹

封四:华灯璀璨 盛利民

刊名题字:俞灵君

地 址: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街28号职工之家1号楼1808室

邮 编:311300

电 话:0571-63721571

邮 箱:65470965@qq.com

## 以守好红色根脉的担当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袁家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统筹“两个大局”、统揽“四个伟大”,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宏大的格局视野系统回顾了我们党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系统回答了在新征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胜利前进的动员令。浙江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放入大场景、把握大逻辑、悟出大道理,努力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是一个不断深入、常悟常进的过程。我们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深刻领会“六个新坐标”:一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标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坐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贯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闪耀着人民至上的如磐初心、闪耀着开创未来的政治自信,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深化,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推向了新的高度。二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标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新坐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开始就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成就彪炳史册、映耀千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民族复兴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三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标注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新坐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鲜明阐释了“一个主题”和“四个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些奋斗历程、伟大成就极大鼓舞激励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四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标注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新坐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首次概括凝炼了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我们党从建党之初的50多人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精神密码和内在动

力,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五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标注了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坐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鲜明提出了“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这“九个必须”,既是百年历程的经验总结、又是未来道路的方向指引,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为全党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开创美好未来注入了强大动力。六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标注了共产党员提升政治能力和党性修养的新坐标。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展现了党中央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对共产党员的殷切期望,奏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强音。伟大号召振奋人心、催人奋进,激励共产党员在新征程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在守好“红色根脉”上更显担当、再续华章**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辉煌精彩,这其中最鲜明的底色就是“红色根脉”。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红船诞生,这是“红色根脉”的

源头坐标。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这是“红色根脉”的新时代标识。守好“红色根脉”,是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自觉行动,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对当下最好的把握、对未来最好的作答。一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论述,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上更显担当、再续华章。以构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年度评估机制为抓手,形成体系化、全贯通、可衡量、闭环式的工作机制,扎实开展总体评估、分领域评估、分区域评估,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二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的重要论述,在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上更显担当、再续华章。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对照“重要窗口”重点内容,抓紧抓牢重大战略抓手,加快打造更多具有浙江辨识度的“金名片”,全面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辉煌成就和制度优势。三要认真学习贯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

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的重要论述,在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上更显担当、再续华章。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撬动、赋能现代化,深入实施人才强省、创新强省首位战略,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路径,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四要认真学习贯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重要论述,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上更显担当、再续华章。坚决扛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探路的光荣使命,率先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持续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着力推动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积极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要认真学习贯彻“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红色根脉”的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自觉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从中汲取忠诚的力量、为民的力量、创新的力量,走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前列。

## 以建设变革型组织、提高领导干部塑造变革能力为突破口,开辟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回顾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光辉历程,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有清晰的愿景、有崇高的使命追求,坚持人民至上、走群众路线,激发动力活力、勇立时代潮头,具有着强烈的斗争意识、高超的斗争本领,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并推动社会革命。面对新要求新挑战,要交出新征程上的高分答卷,我们就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六大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新进展。重点是提升“八个力”:一是不断提升洞见力,做到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坚持观念、知识、行动的统一,紧跟时代步伐,促进

观念更新,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善于抓纲带目找到关键突破口、重要抓手,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感知风险。二是不断提升先决力,保持敏锐直觉,善于相机决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决策的大局观、战略观,进一步增强主动意识、竞争意识、前列意识,先人一步、快人一拍进行创新、作出决定,努力取得决策“时度效”的最大效应。三是不断提升整合力,加强体系重塑、功能优化。坚持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推进内外部资源、力量全面整合,建立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推进党组织的全面覆盖、有效覆盖,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迭代升级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党政机关整体智治、高效协同、闭环管理。四是不断提升耐压力,保持奋进者姿态、激发创造性张力。发扬革命精神、保持蓬勃朝气,敢于逆风前行,勇于争先创优,走出“舒适区”、步入赛道,全力以赴、锐意进取,拉高标杆、追求卓越。五是不断提升执行力,做到唯实惟先、善作善成。发扬斗争精神,抓工作一贯到底、不折不扣,不谈条件、不推责任,健全工作落实闭环管理机制,围绕工作链构建责任链,着力形成“滚雪球”效应。六是不断提升创新力,树立系统思维、数字化思维、现代化思维。从更大场



景、更深层次谋划改革,推动党建理念、方式、手段全方位全要素创新,形成抓党建带全局的有效机制,以数字化改革打破各种瓶颈、激发全社会活力。七是不断提升学习力,以开放胸襟主动接受新生事物。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进生成性学习,提升现代化知识素养,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八

是不断提升自我革新力,激发生机活力、永葆政治本色。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纵深推进清廉浙江建设,始终保持党的血液新鲜、推动优秀干部人才辈出,持续整治作风顽疾、及时清洗灰尘,以零容忍的态度切除肌体毒瘤,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资料原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8月4日第1版)





## 在新登战役纪念会上的讲话

粟戎生

(2019.10.1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

我最近身体欠佳，不能参加纪念活动，对此表示歉意。请王苏炎同志代我发言。

今天开会纪念新登战役，这是宣扬红色、不忘初心的好事！新登战役是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中第三次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全面地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战略远见、斗争艺术，我建议要从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到天目山战役胜利，来学习、宣传和研究这一段历史。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大规模战略反攻阶段。在欧洲战场，德军处于被东西夹击的困境；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本已面临穷途末路；在中国的敌后战场，我抗日军民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转入了局部反攻。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态势，正在转变为敌人的据点被根据地封锁包围。9月共产党中央指示华中局：为了准备反攻，配合盟军可能在东南

沿海的登陆，我军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并要求新四军的西进南下行动，要以南下为主。苏南和浙东的形势也具备了保障我军大部队南下的条件。

我的父亲粟裕对于发展东南的任务，怀有特殊的革命责任感。因为从1934年7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再到新四军初创至1940年6月，他一直转战在这一片地区。所以他当即请求由他率领苏中的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1944年12月底，经过周密准备，他带一师指挥机关、三个主力团和地方干部近万人，渡过日伪严密封锁的长江，顺利进至茅山地区过新年，而后于1月6日到达长兴，与在此坚持斗争的十六旅部队胜利会师。1月13日奉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为司令并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全面领导江南和浙东地区党的工作、谭震林为政委（但因其他任务未到期）、刘先胜为参谋长，4月叶飞和钟期光从江北过来，分别担任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金明

也过来,主要负责地方党的工作,从此东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属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十六旅为第一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支队相当于团);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所属部队为第四、第五、第六支队;苏中首批南下部队为三纵队,司令陶勇,政委阮英平,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支队;苏中第二批南下部队到达后编为第四纵队,司令廖政国,政委韦一平,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支队。与此同时,地方党委、行政区划及干部配备也作了调整。还建立了苏浙公学。

按照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挺进苏浙敌后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略反攻开始,我们要能够打击日伪、收复南京、进入上海、直接配合盟军登陆,使我们能在日寇崩溃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们能够在东南独立地就地坚持,成为全国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一翼。具体的任务是:深入苏南工作;打开浙西局面;打通与浙东联系。苏浙军区领导在理解任务的基础上,对敌情、社情、地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分析,认为要完成上述三项任务,关键都是控制天目山。

天目山位于浙西,与安徽为邻,是国民党军队第三战区与日伪军占领区的交界线。我军就是要在交界地

区发展,目的是为了很好地抗日。所以,既要准备与日伪军作战,又要准备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战。因为,日伪军不会让新四军在这里生根,国民党顽固派也不会让新四军在这里发展。粟裕对作战行动做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指挥部队做了充分地准备。明确了作战方针,对日伪顽可能的行动作出预测,并制定了多个作战方案。对日伪作战是以游击战为主,坚持原地斗争,抗敌袭扰,坚决歼灭地方土匪武装。对顽固派作战是在政治上保持主动,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军事上以运动战为主,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保证打赢。对地方党政工作的要求是开辟新的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教育和发动群众树立民族、民主意识,真正理解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建政权的主张。这实际是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奠定群众基础。由于方针正确、指挥得当、部队英勇、群众支援,苏浙军区部队在浙西浙东苏南的广大地区,打击日伪,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日伪的袭扰,歼灭了助日伪为虐的土匪武装,占领了杭州以北的递铺、三桥埠一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占领了莫干山,威胁到被日军侵占的杭州。国民党顽固派担心我们的迅速发展会危及他的利益,于是在日伪的默许下,主动向我军发起三次进攻。我军被迫反击,于1945年2月至6月间,在天目山

地区三战三捷,取孝丰城、夺天目山、也为皖南事变报了仇。新登战役是新四军第三次天目山战役的组成部分,对诱敌深入,保障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对反顽应该怎么看。现在有些人认为,跟台湾跟国民党要合作,不宜再讲反顽。我觉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这个地区,反顽和抗日是一个整体,不反顽就不可能更好地抗日。现在,即使共产党、国民党能再次合作,为了达到真正持久的团结,我们也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再重犯历史的错误。所以重温这段历史,对过去、对现在、对今后都是有益的。

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浙军区部队奉命向在军区作战任务区范围内的一切日伪军,发布向我投降的命令,但蒋介石却不准我军受降,并命令日伪军不准向我军投降。在这复杂、紧急的形势下,苏浙军区领导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今后局势如何发展,无论是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或准备应付内战,解决日伪问题是最紧迫的第一等任务。因此决定迅速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尽一切方法,力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占领尽可能占领的城镇,对敢于抗拒的日伪军坚决予以消灭。苏浙军区部队当即全力出击,从8月16

日起在浙东、浙西、皖南、苏南,从日伪手中先后收复了南汇、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广德、郎溪、高淳、宜兴等县城和大小集镇一百余处及广大乡村。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再次谈判。为了避免内战,共产党主动提出让出江南的大片民主根据地,由于苏浙军区在这之前占领和建设了大片的民主根据地,这就使得和国民党的谈判,在政治上更为主动、更为有利。9月19日,苏浙军区部队奉命渡江北撤,至11月中旬,苏南、浙西、浙东、皖南的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共六万五千余人,分别到达苏北和山东与兄弟部队会师,共同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在军区北撤前,对留守工作作了具体布置。在苏浙皖边地区组建了苏浙皖特委,配备了精干的武工队掩护活动,保卫抗日人民的利益。向广大群众做了宣传工作,成立了各地新四军留守处,领导坚持原地斗争,各地留下的干部和部队在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直到苏浙全境获得解放。

苏浙军区这段历史,历时十个月,以劣势兵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局面,胜利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任务,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组成华中野战军并进行更

艰巨、更光荣的战略战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既要缅怀先辈的光辉业绩,又要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战略胆识,传承先辈的革命事业,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做贡献!

要学习他们自觉的革命责任感。中央刚一提出要向南发展,粟裕就提出由他带领部分主力去执行南进的任务,各部队的指战员也积极要求参加南进的行动,许多地方党政干部也积极要求去参加开辟新区的工作。正是有这样的革命责任感和革命积极性,所以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并不多,但部队战斗力极强,所到之处横扫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工作队干部能力强,根据地新区建设卓有成效。现在建设国家振兴中华,同样需要有这样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我们的目标才可能实现。

要学习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措置裕如的领导能力。在苏浙军区的任务范围区内,京沪杭是日伪的经济命脉,苏浙皖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重兵驻地,我军要在这里求发展,各方为各自的利益都在尽其所能地博弈,使三足鼎立的斗争形势变得极端的复杂。苏浙军区的领导,灵活运用军事政治斗争的策略,打击了日伪军、反击了蒋介石顽固派,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现在我们面临的世界政治形势、世界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

杂,必须学习革命先辈的战略远见、博弈技能并加以发展,我们的目标才能达到。

要学习他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始终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的高尚情怀。大部队进入新区时,但该地区上一年农业受灾,粮食歉收,又正值冬春缺粮时节,粮食供应极端困难,有一段时间几乎断粮断炊。但部队坚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绝不与民争利,以野菜野果充饥,抓紧一切时间,动员一切力量,开展生产自救,与群众共渡难关。现在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仍然需要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决反腐倡廉。我们才有可能带领人民共同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

作为一个退休老军人,我还想说要学习他们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和部队的优良作风。苏浙军区部队历经大小战斗千余次,面对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对不同的对手要有不同的作战指导和不同的作战方法。对日伪要以游击战为主,对顽军要打得有理有利有节,要以运动战为主。特别是天目山的三次反顽作战,显示出指挥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部队能征善战密切协同的优良作风。当代军人要想在未来高科技战争中不辱使命决战决胜,就必须传承先辈指挥艺术的精髓和优良的战斗作风。

要学习他们英勇战斗的献身精

神。在残酷艰苦激烈的斗争中,部队指战员、地方党政干部、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的英勇战斗的献身精神,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在天目山三次作战中,新四军许多指战员为了保障战斗的胜利,不惜自己流血牺牲,一支队支队长刘别生、二支队政委丁麟章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伟大的革

命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崇敬! 他们的许多光辉业绩值得我们永世不忘! 这也是我们完成振兴中华伟业必须永远学习的精神!

谢谢大家!

(作者为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大将之子)

铁军劲旅，  
天目反顽；  
三战三捷，  
威震江南。

粟戎生

二〇二一·〇六·十九

粟戎生为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题字

## 共产党员的风骨与情怀

——在“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巡回展(第七站)”上的讲话

王苏炎

今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和振奋。我的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作为一名革命后代和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员,响应总书记的号召,结合父辈的革命经历,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月24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原一师分会会长刘华苏少将给我发来几张临安板桥镇新四军历史纪念馆以及展馆中我父亲与江渭清伯伯的照片,我随即与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刘金炎副主任取得联系,刘主任热情地说,希望您早点回临安看看,他特别强调是“回”字。我想,这就是老区人民对新四军的怀念之情!虽然我们的父辈基本上都不在了,临安人民把深深的怀念之情就寄托在新四军的后代身上了。今天很高兴,我们这些新四军苏浙军区指战员的后代们来到了当年父

辈们浴血奋战的土地上,重温天目山三次反顽的艰难历程。临安的同志请我给大家讲几句,我不是什么宣讲,也不是上课。就讲两个故事。

### 一、战友情深——粟裕和“叶王陶”

早在1940年10月,粟裕和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人在黄桥战役中第一次并肩作战,以少胜多,取得了黄桥决战的伟大胜利。从此,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叶飞、王必成、陶勇三员战将率领的三支劲旅一直并肩作战,威名远扬。三位司令员的姓联在一起被简称为“叶王陶”,成为传奇人物,传颂大江南北。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4月到任),王必成和陶勇则是苏浙军区一纵和三纵司令员。1945年3月在第二次天目山反顽作战中他们又一次并肩作战,解放了临安。他们既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又有各自的鲜明个性特点。粟裕和“叶王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结下的战斗友谊更是情深似海。

在粟裕大将去世一周年的日子



里,1985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登载了我父亲王必成的一篇题为《杰出的军事家——怀念粟裕同志》的纪念文章,父亲在文章开头写道:“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到建国后的建设时期,我在粟裕同志的指挥和领导下战斗、工作了大半生,结下了最纯真、最亲密的革命情谊,是语言难以表达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以自己的言行写下了一部道德高尚、沉着机智、文武兼备、才华出众的杰出人物的光荣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光辉业绩,将永垂我党的史册。”

文章从杰出的战略思想、高超的指挥艺术、非凡的革命胆略、卓越的带兵才能等四个方面阐述了粟裕大将作为杰出军事家的丰功伟绩。

文章刊出后,粟裕伯伯的夫人楚青阿姨专程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文章写得很有感情,表达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战斗情谊。

对于这样一位有胆、有识、集军事理论与作战实践于一身的战略家,一位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常胜将军,却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受了错误的批判,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蒙冤达36年。直到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共同署名的文章《追忆粟裕同志》一文中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

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错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伯伯在去世10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公开平反。

1958年,我父亲出席了军委扩大会议。作为跟随粟裕征战多年,长期在粟裕领导下战斗、工作的父亲,自然被作为重点工作对象,指定他在会上发言,要他检举揭发粟裕并与之划清界限。

凡是认准是对的事,父亲是不会轻易改变和屈服的。他深深了解粟裕的为人,根本不相信强加在粟裕身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可能划清界限。既然被点名发言,不“检举揭发”是过不了关的。然而,父亲的发言令那些强加给粟伯伯罪名的人大失所望。他说:“我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有两点体会最深,那就是‘大’和‘谋’。记得济南战役即将胜利尚未结束时,粟裕就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议打淮海战役,基本解决蒋军的主力。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伟大胜利。这个‘谋’有多大,不敢评论,也没有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很清楚。至于‘阴’的一面,我不知道,也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

父亲仗义执言,震撼了一些人,也感动了一些人。会后贺龙元帅对人说:“王必成可深信、可深交!”父亲戎



马一生很少流泪,但当他听到粟伯伯去世的消息却流下了深情的泪水,长时间陷于极度的悲痛之中。他打电话给楚青阿姨表示深深的哀悼和亲切慰问,又叹又愤地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直到1989年3月,我父亲去世时也未听到有关粟伯伯平反的消息,这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悲愤与遗憾。当刘华清、张震的文章发表后,楚青阿姨立即打电话给我母亲,要她把登有《追忆粟裕同志》文章的报纸放在父亲的遗像前,以告慰他在天之灵。这张报纸直到现在还放在我父亲的遗像前。

我父亲跟陶勇叔叔性格迥异,一个内向寡言,一个外向开朗,但率兵打仗却都勇猛顽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性格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两人的交往,只要一见面,我父亲也会被他感染,话语比平常多了许多,有说有笑,亲密无间。金冶叔叔曾在《虎将王必成》这篇纪念文章里描述他俩的关系:华野召开作战会议,王必成都紧靠陶勇坐在一起,关系融洽。作战时,第四、第六纵队互相配合积极主动;平时见面打打闹闹、无拘无束,在电话里也经常是骂骂咧咧。金冶叔叔说起陶勇叔叔跟他讲起的一个故事:1947年第四、六纵队配合作战,陶勇打电话找王必成问问情况。总机接通后,陶勇拿起电话像平时开玩笑似地骂了一句:“他妈的,老王,你在干什么呀?”哪知

总机把电话接到陈毅司令员那里。陈毅拿起电话说:“我是陈毅,陶勇你干什么啊?”陶勇吓了一跳,连忙回答:“我找王必成,怎么接到你那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和陶叔叔还经常通电话,询问情况。就在陶叔叔被害第二天,父亲到处打电话找不到他,后来找到当时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问:“老陶哪里去了?”刘回答:“陶勇投井自杀了。”像陶叔叔那样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会自杀,这是父亲无论如何都不可想象、不能接受的。得此噩耗,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话语更少了,他为失去这样一位生死与共、长期并肩作战的挚友莫名其妙地被迫害致死感到无比悲愤和惋惜。

父亲20世纪80年代初搬回南京定居后,曾多次跟金冶叔叔谈起陶叔叔,每次都百感交集流露出对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父亲要金冶叔叔编一本纪念陶勇的书,这是粟裕伯伯托付给父亲的。在父亲病重期间,金冶叔叔去看望他,父亲还问起纪念陶勇的书何时才能出版。金回答1990年脱稿排版,争取出书,父亲说:“那我恐怕看不到了。”父亲1989年3月去世,这也成了他一大遗憾。

父亲和叶飞叔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解放后,父亲跟叶飞叔叔虽然不在一地工作,但在北京开会时还是经常见面的,

在福州、南京、上海也偶有相聚，这时他们都会嘘寒问暖、互致问候。

父亲一贯清正廉洁，不吃请，不受礼。但是有一次他生病住在解放军总医院，叶飞叔叔和王于耕阿姨去看他，问他需要什么，他破例向叶飞叔叔要一台收录机（当时还比较稀罕）和一副麻将牌，叶飞叔叔很快给他送了过去。

1989年3月父亲去世，当时叶飞叔叔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正值“人大”开会期间，叶飞叔叔请假专程来南京参加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他深情地对我母亲说：“‘叶王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能不来呢？”这充分体现了“叶王陶”深厚的革命情谊。

现在，粟裕伯伯、叶飞叔叔、陶勇叔叔和我父亲都已先后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他们之间纯真的革命情谊却与日月同辉、与世长存。

## 二、走进英雄“老虎团”

在江苏丹阳西南行宫乡贺甲村，有一座破旧的两进祠堂——贺甲祠堂，山墙壁上弹痕累累。当地群众皆知，这是父亲王必成当年指挥部队痛歼日本侵略者的史迹。而这次威震江南的贺甲战斗，又称延陵大捷，使王必成和他任团长的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威震江南。

延陵位于茅山山麓，与镇江、金坛

相邻，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也是东进北上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重要。1939年11月初，日军抽调兵力对茅山地区分区“扫荡”。7日深夜，日军一个加强中队100余人，向丹阳九里镇、延陵地区“扫荡”，于8日拂晓前直扑延陵。父亲王必成指挥第二团、新六团和丹阳独立支队等部，于当日下午向日军发起进攻。经过连续26个小时强攻歼敌，共毙敌武村中队长以下168名，俘日军3名，开创江南敌后战场村落进攻战斗歼敌新记录。父亲曾在战斗经验总结中说：“这次战斗和以前的战斗性质不同，以前是游击战，而且时间是短的，这次是运动战，而且是一个长时间的战斗，打了整整26个小时，我们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提高了部队本身战术上的素养，增进了部队在战斗动作上的经验。”

贺甲战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 and 人民的斗志，受到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报通令表扬。上海进步报纸以《伟大胜利在江南》为标题加以报道，谓之“延陵大捷”，从此，苏南人民群众自发地称第二团为“老虎团”，父亲王必成被称为“老虎团长”“王老虎”。在父亲之后，还有段焕竞、郭猛、刘别生、饶惠谭、张强生、颜伏等同志担任过“老虎团”团长；而刘培善、郭猛、李延杰、吴嘉民、罗维道等同志担任过“老虎团”政委。

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它的前身是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坚持在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的游击队。父亲1938年春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到二团。在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取得卫岗处女战的胜利后,他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贺甲)之敌,连战皆捷,创造了新四军对日作战多个“首次”。新丰车站战斗,是新四军的首次夜间战斗;句容战斗,是新四军首次攻入敌占县城的战斗;东湾战斗,是新四军典型的攻点、打援兼顾的战例;延陵(贺甲)大捷是新四军首次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战斗。解放战争时期,“老虎团”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几乎所有重大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国民党王牌军——张灵甫整编第74师。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二团入朝,先后在东线元山港、中线上甘岭地区作战10余次,歼敌800余人,击落敌机11架,击毁坦克7辆。1955年“老虎团”凯旋,进驻北京。现“老虎团”为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第5团。警卫三师前身就是16旅,也即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作为首都卫戍部队的第一王牌团,曾多次担当重大国事活动的安全警卫

任务,军委、总参、军区赋予的紧急任务,国庆阅兵和亚运会、全运会、大运会等开幕式的大型文艺演出团体操表演任务,受到中央首长、军委首长和军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誉。2005年7月1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一篇报道《虎啸生风‘老虎团’——北京卫戍区某摩托化步兵团巡礼》,说的就是这支英雄部队。当天,《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作了报道。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饮水不忘掘井人”,今天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有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是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和前辈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换来的,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代代传下去》,这就是我今天讲话的初衷。

(作者为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六师分会名誉会长,王必成中将之女)

## 浅谈衣锦城与衣锦街的历史

许锦光

### 衣锦城历史脉络

衣锦城是吴越国国王钱镠所建。钱镠发迹后,在锦城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修建了衣锦城。衣锦城最初为屯兵驻军的军事营垒。唐昭宗龙纪元年(889),“钱镠始筑营垒于临安茆山”(今太庙山),892年,营垒修筑完成。最初名为安众营,后改为衣锦营。唐天复元年(901),钱镠衣锦还乡,“升衣锦营为衣锦城……次年建城垣,治沟洫”(修筑衣锦城直接引发了吴越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武勇都之乱”),衣锦城设施更加完善,更加坚固。从历次考古情况推算,五代时期“锦城东起塔山路,西至天目路,南起城中街,北至太庙山”。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衣锦城“周围五百二十步”。按照古代通行的五尺为一步,宋官尺1尺长约31厘米,一步距离在1.55米,临安城周长只有800米左右,城内面积狭小,无法容纳太多的人口。

衣锦城建成后,后世并未增修。到明成化时,衣锦城城墙已经废弃,成化《杭州府志》记载:“临安县旧有城,

周回五百二十步,池在东北,钱氏时名衣锦城,今圯。”嘉靖五年(1526),县令廖瑜简单修筑了临安城市防御体系,“仍立四门,东会锦、西聚金、南迎薰、北拱极,各竖木栅”。嘉靖三十四年(1555),为防御倭寇,“县令魏希古设土垣以资防御,周五里,高一丈,土垣内外俱民产,各随业修葺,岁以为常,壕环如故。”临安县令黄鼎象曾上奏修筑临安城墙,但是未获得批准。明代衣锦城基本格局为“入会锦门而西大街,过县治至聚金门,其南为立礼坊(出至小东门),为德化坊(通小南门),为制锦坊(进巷通儒学),为书锦坊(进巷通迎薰门),北为钱武肃王墓道(通北拱极门)。”明代的衣锦城规模比钱镠所建的衣锦城要大,但军事防御能力要弱上许多。明末徐霞客在《浙游日记》中这样记述衣锦城:“土城甚低,县廨颓隘。”

清代衣锦城继承了明代的基本格局,并有所扩大,周长5里。根据清代胡望斗的《安国山记》记载,清代临安城有八门,分别为东门、小东门、沙井门、北门、南门、小南门、西门、小西门。

明清时期临安城市有城门无城墙,用于防御的土垣也是“旋筑旋坏”。城市面积狭小,人口不多,从清代《临安县志》记载的市民数来看,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清康熙十四年,临安市民人数为498人;到雍正九年才增长到539人(此类市民数并不是全部的城市居民,只是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口,真实市民数应大于这个数字),几乎停滞。清乾隆《临安县志》这样描述衣锦城:“居民山落环邑,仅数百余廛,仓库、狱囚、堤防匪易。”城小民寡,防御设施简陋,临安市与其说是城,还不如说是一个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大镇。

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与清军、地方民团在临安展开多次激烈交锋,临安、於潜、昌化三县损失惨重,人口锐减,衣锦城也在此时遭到严重破坏。清光绪年间,衣锦城重建;光绪十六年,重建东西门楼;光绪二十六年,重筑城墙,并建南北栅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五次来犯衣锦城,并派飞机轰炸。衣锦城内建筑几乎全部被炸毁,成为废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衣锦城范围东至东门(今农林大路),南至南门水沟(在今天目路农经总站附近),西至西坛(今临安区人民医院东面),北为安国山。街道仅丁字形直横两条(大街、横街),主街长约900米,沿街仅有少数两层砖木结构房屋,绝大部分是平房和茅草屋。

### 衣锦街历史脉络

衣锦街历来就是衣锦城最主要的道路。清代,衣锦街分为东西两段,衣锦城内东段称之为治前街(民国时期称为大街),城外西段称之为直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为“直街”。1981年6月7日,改名为衣锦街,以衣锦城取名;当时的衣锦街从四柱坊(今农林大路)起至临天桥,全长1700余米,宽20米。2017年,衣锦街东延工程一期建成通车,西起农林大路,东至翠浪路,全长约260米,宽24米。2018年,衣锦街东延工程二期建成通车,西起翠浪路,东至望湖路,全长490余米,宽24米。至2018年底,衣锦街全长2450余米。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难以确定唐末五代时期衣锦城的布局,因此也无法确定衣锦街是否已经建成。南宋《咸淳临安志》中有一幅临安县境图,绘制了当时衣锦城的布局。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安国山(今太庙山)南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横贯衣锦城。这条街位置与走向与后世的衣锦街极为相似,应该就是衣锦街的前身,可惜地图中并没有注出该街的名称。在这条街的南北两侧,分布着钱王太庙、锦台、县学、主簿厅、威德院、酒库、县仓、近民坊等大小几十座建筑;另有几条南北向的小巷与该街相通。从《咸淳临安志》的记载来看,南宋晚期,临安县的县治在西市保锦山(今锦北



街道西墅社区锦城三中一带),但大部分的行政机构都在衣锦城内,分布在衣锦街南北两侧。

明太祖洪武年间,临安县县治从西市保锦山迁至衣锦城安国山,此后600余年不再变动。明清时期,衣锦城的布局继承了宋代的布局方式,即以衣锦街为主路,各公私建筑分布于衣锦街的南北两侧。根据清代胡望斗的《安国山记》和宣统《临安县志》等记载,以县治为中心(县治东面即为钱王陵),衣锦街东段(县治至东门),沿街有秋官坊(明嘉靖时期立,纪念的是曾担任过刑部郎中的临安清官汪焯,牌坊残件现在临安图书馆衣锦街与塔山路交叉口处)、刺史坊(明代立,纪念的是曾担任过工部尚书的俞琳,今无存)、绣衣坊(明代立,纪念的是曾担任过知州的盛杲,今无存);过三坊,则为城隍庙,在安国山左麓,沿安国山而建(今浙江农林大学衣锦校区与钱王陵园相交之地;民国时期为衣锦小学,今无存);城隍庙再往东则是慈胜寺,始建于五代后梁时期(今无存);城隍庙南面有一小巷与衣锦街相通,名叫庙弄(今塔山路),庙弄南段有沙井门(因附近有一口沙井而得名,2017年临安旧城改造前,沙井仍在)。衣锦街县治至城隍庙段南面,则是临安县儒学(文庙),有教谕署、训导署等机构,以及讲堂、斋庐、先贤祠、大成坊等建筑,占地面积极大,往南过应奎楼,直至南门外

的泮池(池面积数十亩,在钱王街交通皇冠酒店附近)。文庙西南侧有高丘名叫锦墩,墩下有一私家庄园名叫胡氏梧园。

衣锦街西段(县治至西门),这段街道两侧主要为民居。由东往西,有大巷(制锦坊)、小巷(昼锦坊)与衣锦街连接。小巷再往西,有丛桂坊,衣锦街在此段被称为“峻街”(因此段曲折有坡故名),丛桂坊附近有许氏适我园,园中有山,为安国山余脉,胡望斗称之为“甲於一邑”。丛桂坊往西就到了西门(在今广场路北端),出西门则是城外。

民国时期,衣锦街被称之为大街,并往西延伸至思古桥(今临天桥)。西门往西,衣锦南面有店弄、横街与之相连,北面有木梳弄、晏公庙弄、会馆弄(因有徽商会馆而得名)等巷弄与之相连;西门以西,人口较少,如临安区人民医院以西的棋盘弄一带曾经就是乱坟岗。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抗日战争等动乱,衣锦街两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只有极少数保存下来。日本侵略军的轰炸造成了程家弄惨案(今区政府大门对面立有纪念碑)。抗战胜利后,衣锦街路面由石板镶卵石路面改为泥石路面,可容两辆车交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衣锦街经历了多次的改造和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衣锦街仍然是临安县城的主轴,临安县人民政府、浙江林学院、临





## “当代梁山的阮氏兄弟”

——阮迪民革命生涯纪实(三)

卞初阳

### 报界巨擘 陇原奠基

1948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31周年纪念日,也是阮迪民和曹冬焱结婚的大喜日子,他们在临汾人民报社编辑部驻地五默村的一个四合院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战斗的考验后,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党的宣传事业,结为革命伴侣。

1949年3月,阮迪民离开亲手创办的《晋南日报》,奉命回延安担任中共陕北区党委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编辑。曹冬焱也调到延安,任《群众日报》助理编辑。

1949年5月,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7月,第一野战军直捣兰州、西宁、银川。就在甘肃全境即将解放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德生任甘肃省委书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长张稼夫、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先后找阮迪民谈话,要他受命随大军西进创办《甘肃日报》,虽然阮迪民对一年时间内三次调动有些不理解,但看到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又感到

新闻创业责无旁贷。最后还是习仲勋书记的话一锤定音:“德生要你,你就上甘肃吧!”早在1945年,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就认识了阮迪民。作为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一直关注着阮迪民办报生涯,对阮迪民的工作能力予以充分肯定,所以特地指派和促成阮迪民去甘肃创办党的宣传新闻事业。阮迪民是解放后陇原创办新闻事业的第一人,开启了甘肃新闻事业的历史篇章。

阮迪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并着手在西安组建甘肃日报社工作班子。针对人员不足的问题,西北局指示从群众日报社抽调,经多次协商,抽调了刘焕文、冯森龄、黄文清、尤力、薛东五位采编人员,还有铁军、张效模、李效民、史秀杰、张一平、高志升、郝书田、张军等记者、行政管理和电台人员共21人。阮迪民将此情况反映给西北局,经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意,由宣传部长张稼夫出面,从陇东报社抽调叶滨、马谦卿、张继成、薛芝荣、宋新民、田世英六位老报人充实办报队伍。

又由西安大学推荐,经个别谈话,招聘了刘英(流莹)、马家枝、曹克己、李亚琳、陈省三、王景超、一帆、梁鉴、罗舒群等12位在校大学生。另外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大学分配到西安的学员中挑选鲁夫和徐列,仅用20天时间,办报人员增加到50人。为开创繁重而又紧迫的事业,阮迪民雷厉风行、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青年学生缺乏新闻知识和工作经验,阮迪民特地创办短期训练班,亲自主讲党的新闻理论和办报基本知识,并把学员分配到群众日报社跟班实习。

8月中旬,一野挥师西进。甘肃省组建甘肃工作团,由罗世英任大队长,阮迪民任副大队长兼报社分队长。甘肃日报社50名办报人员分成两支隊伍,一支在西安,一支在庆阳。西安的队伍由阮迪民亲自率领,先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距兰州还有600公里),然后每人背负20多斤重的行旅和口粮,日行七八十里路向兰州进发。途中休息或战事间歇,老编辑则继续带新人开展培训和采访训练。8月20日,阮迪民组到达定西县时,与从庆阳出发的另一支队伍汇合。他们在定西城隍庙召开会师和挺进兰州办报、办社、办广播电台的誓师动员大会。

8月26日,兰州解放。中共甘肃省委和兰州市军管会要求尽快出报,宣传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和党在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由阮迪民、叶滨、

铁军等10人组成先遣队先赶到榆中县麻家寺附近的薛家营,随着解放军军车进入兰州城参加解放军入城仪式。进城后,采编人员紧张地忙碌起来,电台人员架起设备抄收新华社总社新闻,记者分头采访,那时大家晚上都不休息,累了打个盹,都抱着一个共同愿望,就是要让甘肃人民尽快知道兰州已经解放了。

经省委张德生书记同意确定,甘肃日报社址选定在原国民党政府西北日报社址——中山林。根据兰州地下党的同志介绍,中山林离原国民党省银行、兰州广播电台、银行印刷厂都很近,发展空间大,因而选作甘肃日报社址比较理想。阮迪民以兰州市军管会新闻处长名义立即接管国民党在兰州的《西北日报》《民国日报》《和平日报》《兰州日报》的通讯社、电台等。接管当天,阮迪民和铁军就召集西北日报印刷厂和省银行印刷厂工人召开复工动员大会,动员大家早日复工,尽快出版《新闻简报》,创办《甘肃日报》。工人们忙碌了一个通宵,27日早上就刊出了第一期《新闻简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兰州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报纸,《新闻简报》共刊出5期。

8月31日,在合并后的甘肃日报印刷厂里,杨尊德和工友们用仅有的两台对开印刷机忙碌了一昼夜,9月1日,《甘肃日报》正式出版。社论兼代发刊词《庆祝兰州解放》,是阮迪民在

行军路上写成,根据张德生书记意见修改,并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审阅后刊发。发刊词明确指出《甘肃日报》办报宗旨:“在中共甘肃省委领导下,全心全意为甘肃人民服务。”9月7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开创了新华社甘肃分社。实现了一套人马,三块牌子,“办报、办社、办广播”三位一体同时启动的愿望。那时,阮迪民34岁,身兼兰州军管会新闻处长,甘肃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甘肃人民出版社社长,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是这批创业者中年龄最大的,但他满腔热情,身强力壮,不知疲倦。回顾这段创业经历,在《第一张<甘肃日报>诞生的前前后后》这篇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随着解放军歼敌的炮火不断远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长张稼夫找阮迪民进行一次谈话:“彭德怀司令员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就要向甘肃进军,估计不久就会攻克兰州,为此西北局最近组建了甘肃省委,书记是张德生同志,同时西北局又决定在兰州办《甘肃日报》,想让你牵头,不知你有啥想法?”阮迪民表态:“我这个浙江人确实不太了解怎么到新区去办一份省报,肯定任务重,困难多,但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走到哪里都一样,因此我想只要和同志们闯一闯,也就闯出来了。”字里行间,也看出他对革命事业、新闻事业的忠贞和情怀。

《甘肃日报》是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是甘肃各族人民的报纸,报纸刊头谁来写,阮迪民请示省委张德生书记,经过商定认为党报刊头应请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同志来题写,而当时在兰州只有彭德怀司令员比较符合了。于是,张德生要阮迪民去“三爱堂”(一野司令部驻地)找彭德怀。阮迪民跟彭德怀司令员之间不是很熟,希望德生书记先给说一下。德生书记知道此事阮迪民有点为难,就说:“彭司令对办党报很热心,你尽管去。”于是,在兰州解放的第二天,阮迪民来到“三爱堂”,见到彭德怀司令员,把同张德生商量请彭司令给《甘肃日报》题写报头的意见告诉彭德怀。彭司令热情地接待了阮迪民,但对题写报头很感为难,沉思了好久才谦虚地说,他的字不行,给党报写报头更不行。迪民说报纸马上就要出版了,时间紧迫,是不是暂且先写一个。贺龙司令员也在一旁帮着说:“彭老总,你就写一个吧!过阵子我们再请毛主席来写!”为了尽快出版报纸,彭德怀这才答应下来。第二天,阮迪民派报社的叶滨、马谦卿去司令部取报头,彭司令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告诉叶滨和马谦卿说,写好了会马上派人送去。因此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号上用的是彭德怀书写的报头。不久,阮迪民在兰州见到贺龙司令员,贺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在晋绥边区与阮迪民有过多次数亲密接触,

贺龙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抗战日报》的工作。贺龙一见阮迪民就想起答应过要请毛主席给《甘肃日报》题写报头的事,他说,此次正好要进京面见毛主席,一定请毛主席给《甘肃日报》写新报头,保证没问题。

1949年11月,贺龙特请毛主席为《甘肃日报》题写报头,并托人捎回兰州。毛主席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四幅“甘肃日报”,供报社选用。当报社工作人员得知毛主席为《甘肃日报》题写报头,无不欢欣鼓舞,都说,这是毛主席对《甘肃日报》以及甘肃人民最大的关怀和鼓励,表示一定要全力以赴把《甘肃日报》办好。报社接到毛主席题写的报头样稿,召开社委会议,达成共识,从四幅字中选好一幅,制成铜版(后改制为钢版),决定从12月1日启用毛泽东主席写的报头,迄今为止仍在使用。毛主席为《甘肃日报》写的那幅报头手迹,报社专门做了盛装盒子,用红色绸缎包装,一直保存在甘肃日报社的档案室。

阮迪民在甘肃期间身兼数职,集甘肃的新闻宣传和文化创业于一身。他团结带领新老新闻工作者,一步一个脚印,以笔为刀,为纸为石,以镜头为语言。《甘肃日报》是紧密围绕中共甘肃省委中心工作,服务甘肃2600万各族人民的地方党报,创建了甘肃日报、广播电台、出版社、通讯外宣等宣传文化事业,并使之发展壮大,宣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甘肃省重大事件和中心工作,发布中共党和政府的指示,方针政策,具体步骤,推动甘肃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业。《甘肃日报》成为中共甘肃省委机关报,人民电台成为人民的喉舌,电讯成为人民的心声和风向标。阮迪民创业时立足于土窑洞、破屋、草棚,艰苦创业,百折不挠;发展时高瞻远瞩,立足高远。上世纪五十年代由阮迪民主持兴建的甘肃日报编辑大楼,至今仍屹立在兰州的皋兰山下、五泉山以东的白银路,当时是兰州代表性建筑(现已成为《甘肃日报》的报史馆)。

阮迪民十分注重新闻宣传文化事业的建设,起到楷模的作用。在他的影响和传帮带下,甘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不少人日后成为甘肃省高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成为陇原新闻广播出版事业的骨干力量,成为甘肃省内外有影响有成就的老报人。

阮迪民从自己开始,在甘肃日报社淡化等级观念,不称官衔,一律以同志相称的好作风传遍了甘肃省所有的新闻单位,无形之中消除了等级特权意识。领导不称职务,直呼其名,甚至可以起外号。如阮迪民就叫老阮,或尊称阮老;铁军叫老铁,曲鹤云叫曲胡子,王明远叫王铁嘴。被叫者从不以为是嘲笑讥讽,叫者习惯成自然更觉得亲近。没有官架子,没有隔阂

和距离。生活上毫无特殊化,大家平起平坐,亲密无间,养成了报社无论工作多辛苦,生活多困难,领导与群众始终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许多老同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难以忘怀。

阮迪民爱才、用才、护才,在甘肃日报社也是出了名的。在甘肃日报社或甘肃新闻文化战线,不管你出生如何,家庭背景怎样,只要真正参加革命,又有才华,能为新闻事业而奋斗的,就一定能得到提拔重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甘肃刚解放时,有一家私人办的刊物《新民主报》,按中央规定不允许办,因而将其全部人员并入甘肃日报社,其中不少是旧社会过来的“旧报人”。阮迪民全面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因材施用。即使在左倾思想严重、历次政治运动形势严峻的时候,阮迪民仍然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保护和珍惜人才。虽然有的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苦落难,但作为总编辑的他尽最大的能力保护。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甘肃日报社根据中央“关心群众生活,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精神,选择了兰州铁路局在处理局属职工张凌虚工作和生活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进行报道,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受到读者的好评。这个报道是经过主管工业的省厅厅长,省委两位副书记批准发表的。1957年,有人将此事当成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事件看待,将报道此事的记者杨康、梁军两位同志当成右派来打压,将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莫耶也要当成右派。阮迪民参加了省委的会议,不同意把责任推给这三个采编人员身上。阮迪民说,反对官僚主义是党中央的决策,莫耶用“张凌虚事件”进行具体剖析,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莫耶1937年毕业于延安抗大,是《延安颂》的作者,一直在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社做总编辑,转业后才到甘肃日报社主持工作,杨、梁两位编辑更是就事论事,因此不能被打成右派。因而在“文革”劫难中,造反派强加给阮迪民最重要的“罪状”就是包庇“牛鬼蛇神”。造反派指着已被批斗了无数次的几十个报社新老新闻工作者问:“你包庇了多少?”阮迪民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包庇!”造反派无计可施要动“武斗”。

1960年1月,阮迪民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趁会议中途休息之机,阮迪民作了回乡探亲之行。这可是阮迪民自1937年离家别乡后,第一次返乡探亲。

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杨洪大队的电话响了,电话里传来昌化县潜阳人民公社(1958年於潜县、昌化县合并为昌化县)党委副书记徐孝来的声音,说



第二天上午有一位重要领导同志要来杨洪视察工作,让大队作好准备,并派人去乡公所迎接。杨洪大队一面通知第二天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并派了大队长蒋成福、党支部书记吴记宝、党支部副书记阮焰荣三人去潘家乡公所迎接。次日晌午,阮迪民在昌化县公安局和潜阳公社等领导的陪同下,坐小吉普车到平渡,一路走到潘家乡公所,会同大队干部经墙里、阮家、杨家,到杨洪大队部所在地黄家,见到早已等候着的三四十个人。到这时,大家才弄明白是阮家的荣寿回来了。

县、公社领导再三要求阮迪民给大家作报告,他只好简约地讲述最近党中央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总体要求,相关的政策方针;结合在途中了解到的,杨洪原先的阮家光明社、黄家金星社、双溪口五星社三个合作社统一建立杨洪大队,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以队所有制的大队建设好,发展好,争取早日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的杨洪村;看到大跃进中提出的“打通沿山路,汽车到平渡”,凌龙公路分段开发,称赞这是件大好事,是彻底改变贫穷落后、交通闭塞面貌的唯一出路。他希望县、公社领导要多来杨洪村指导,立足村落的竹林资源,发展竹林产业,造福家乡人民。最后,阮迪民还无比激动地说,自己虽然离开家乡,在晋绥、陇原战斗工作了20多年,但一直非

常挂念亲人和乡亲们,总有割舍不下的对家乡、对故土、对亲人的思念……中午,阮迪民同县、公社、大队干部一同在黄家的大队部共进午餐,当阮焰荣挟起一块本地新鲜的黄麂肉让迪民品尝时,迪民深有感触地说,有将近三十年没有吃到黄麂肉的美味了。说话间,阮迪民深情回忆起当年在家乡生活劳动的情景,席间充满了浓郁的乡情味。

午饭之后,阮迪民去山上父母和两位兄长的墓地拜祭,又回到自己出生和幼年居住的老屋,见到了侄儿辈亲戚。阮迪民途经潜阳时,特地去看望四姐阮爱娣,土改时她家被划为资本家兼地主,“天生堂”被充公,土地没收,全家住在阴暗潮湿的旧屋里。四姐身体十分虚弱,抱着阮迪民痛哭。因要赶回上海开会,阮迪民与四姐匆匆告别,不想成了姐弟间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四姐就去世了。

阮迪民匆匆回了趟家乡,又匆匆离去,似乎留下了一些遗憾在心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无论经历了多少曲折,承受了多少苦难,他始终保持着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思想品质和作风,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作者为临安区钱镠研究会理事、区作家协会会员)

## 钱惟演与《西昆酬唱集》

顾彭荣

钱惟演(977—1034),北宋大臣,西昆体骨干诗人。字希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少时好学。太平兴国三年(978),随父降宋,任右屯卫将军。宋真宗时,招入学士院。在朝会上,以笏起草诏令,迅即而就,甚得真宗赞赏。咸平(998—1003)初,任太仆少卿,进《咸平圣政录》。因博学能文辞,景德(1004—1007)中,进入直秘阁,修纂《册府元龟》,并与杨亿分纂部门序,常在编书余暇与杨亿、刘筠等十七人唱酬,结集为《西昆酬唱集》,号“西昆体”。

宋真宗时历任直秘阁、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等职。仁宗即位后拜为枢密使,以同平章事(宰相)的头衔出任许(今河南许昌)、陈(今河南淮阳)等州。起初依附宰相丁谓,排斥寇准,等到丁谓因故将获罪,又排斥丁谓以求自我解脱。为人喜好趋炎附势,多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献于朝廷以邀恩宠,尤善于以联姻手段巴结皇室,攫取权利,为时论所鄙薄。初谥“思”,明确其有过而能追悔自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由其子诉请,改谥“文僖”。

钱惟演一生奔波宦途,数度沉浮,政绩平平,人品虽不足称,但雅好文辞,文学创作上颇有建树。家中藏书极富,可与秘阁(国家图书馆)相比,尤其藏有很多古代书画,后人亦将其归入藏书家之列。

钱惟演是“西昆体”的骨干诗人,当时与杨亿、刘筠齐名。后由杨亿汇辑成《西昆酬唱集》两卷,辑入其近体诗54首。《西昆酬唱集》共收17人、250首诗,形成宋初一大诗派,即西昆派,在宋初诗坛风靡几十年。钱惟演作诗,确实是杨亿所说的“特工于诗”者。但与杨亿、刘筠相比,虽也学李商隐诗歌之词采妍华,追求辞藻,好用典故,而意象不似杨亿那么繁密,语脉则较为清畅,借用杨亿的话说,是偏于“演绎平畅”,而非“包蕴密致”,情调则为“清峭感怆”(《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

钱惟演学识渊博,平生著述甚丰,《宋史》本传记载有《典懿集》三十卷。又有《枢庭拥旆前后集》《伊川汉上集》《金坡遗事》《飞白书叙录》《逢辰录》《奉藩书事》等随笔。另又采集吴越国五代国君之诗,合编为《传芳集》,多已



佚失。所著今存《家王故事》《金坡遗事》。钱惟演又喜招徕文士，奖掖后进。晚年以枢密使任职河南府兼西京（洛阳）留守，欧阳修、梅尧臣等一批青年文士聚集其幕下，诗会文游，颇得其袒护支持。有一段轶事流传千古：钱惟演在洛阳任使相（官职名，即西京留守）的时候，十分厚遇文士。谢绛、欧阳修在洛阳供职，曾经一起登嵩山游玩，到达龙门的时候下起了雪。两人正在观赏山景，忽见有人骑马冒雪渡过伊水而来，原来是钱惟演派来的厨子和歌伎，使者传钱相的口谕说：“登山辛苦，两位可以在山上多留一阵赏雪，府里公事简易，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对下属无微不至的关心，尤其是文人间那种心灵相通的意会，使欧阳修等人既感动又亲近。后来钱惟演贬谪到随州，欧阳修等人送行，钱惟演席上赋词，使歌伎演唱，音节悲苦，宾主都为之哭泣。欧阳修对钱惟演的知遇之情毕生没有忘记，在《归田录》里记下了钱惟演在洛阳对他说的话：“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后来欧阳修总结出读书时间的“三上”（马上、厕上、枕上），多半也是受钱惟演的启发。

《西昆酬唱集》两卷由宋杨亿编集，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7人的唱和诗集。集中共收诗250首，其中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的诗占全集五分之四以上，即202首；其余14人的诗，

共48首，占全集的五分之一不足。

这部唱和诗集开始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秋天，结束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秋天，前后三年时间。景德二年九月，宋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等人，开始编纂一部一千卷的巨著，先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后来这部书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纂完成，定名《册府元龟》。参加这部书编纂工作的人，都集聚在秘阁里。秘阁是帝王藏书之地，在《山海经》的《西山经》里，说昆仑山之西，有一座山叫玉山，是西王母居住之地。《穆天子传》里说“天子升于昆仑之丘，至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谓册府。”册府就是指藏书的地方，于是宋代的藏书处秘阁，也就采用这个典故，称它为西方昆仑山的玉山、册府，所以在秘阁编出来的《历代君臣事迹》，后来定名为《册府元龟》，在秘阁里参加编纂工作时的唱和诗集，称之为《西昆酬唱集》。

参加唱和的17人，并不是人人都参加秘阁编纂工作的，像张咏、舒雅，都不经常在东京（今河南开封），丁谓、钱惟演也没有参加秘阁的编书工作，只是因为和杨、刘等人有诗歌往还唱和，所以他们的作品也被收录于这本唱和集里。

唱和者大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其中很多人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有些人后来地位还爬得很高，如丁谓，做到宰相，封为国公，钱惟演做到了枢密

使。由于他们大多在当时是文学侍从之臣,能够接近皇帝,因此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动向,较一般上层人物要清楚。对帝王的私生活(这在当时是严禁泄密的),也略有所闻。这些内容,在他们的平日作品里,都有所反映。譬如集内的《宣曲》诗,就是典型之例。《宣曲》诗是讲到宋真宗私生活这方面的。江休复《嘉佑杂志》里说:“上在南衙(宋真宗未即帝位前,任开封府尹,故名南衙),尝召散乐伶丁香,昼承恩幸。杨、刘在禁林,作《宣曲》诗,王钦若密奏,以为寓讽,遂著令诫僻文字。”意思是:宋真宗未即帝位前,任开封府尹,曾召请宫廷乐伎丁香演奏,丁香深得恩宠。此时翰林学士杨亿、秘阁校理刘筠正供职宫廷,作《宣曲》诗记其事。杨亿、刘筠的政敌王钦若密奏,以为《宣曲》诗暗寓讽谏,宋真宗即位后下令告诫,僻除诗歌文字。《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大中祥符二年(1009)春正月己巳,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事涉浮靡。’乃下诏风励学者,‘自今有属诗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可见这部《西昆酬唱集》编成流布后,就被杨亿的政敌们作为告御状的材料,把它告到宋真宗那儿去,罪名是泄漏掖庭春光,由此而给予警告的处分。本来像《西昆酬唱集》这一类的唱和诗集,往往是不容易受人注意的文学作品,

但由于得到“属词浮靡,不遵典式”的警告,反而抬高了这部诗集的身价而引人注目起来。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兵大举南下,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避往西蜀,参知政事王钦若建议逃向金陵,宰相寇准主张抵抗,并请真宗亲统大军去澶渊前线。辽大军南下后,其前锋大将挾览中流矢而死,辽军见南进受阻,攻宋一时未易得手,就放弃索取关南土地的要求,转而与宋议和,并想藉此勒索大量岁币。宋辽和议成立,逃跑派以王多若为首,转而在宋真宗前攻击寇准等主战派请皇帝至澶渊前线是“孤注一掷”,宋辽澶渊的议和是“城下之盟”,并进说真宗用神道设教,伪造天书,举行封禅泰山、祀奉汾阴后土等典礼,以提高皇室威望,巩固封建统治。这一部诗集的结集,正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秋天。该年开春,宋真宗听从王钦若等的进言,伪造了一幅黄帛天书,挂在宫城的左承天门上。同年冬天,宋真宗还亲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接着而来的是在京都和各地大兴土木,赶造许多宫观,祈求神仙保佑,期盼子嗣绵延。这种祀神求仙的歪风,早在景德末年渐兴,作为帝王文学侍从之臣的杨亿、刘筠等早已觉察,所以他们在这部《西昆酬唱集》里,如在《汉武帝》、《明皇》、《南朝》等诗篇中,借古讽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不同意宋真宗这种求仙祀神、

大兴土木的作法。这些诗篇,在当时统治阶级文坛上,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作品。但从整部《西昆酬唱集》的内容来讲,其诗篇题目如《别墅》《夜宴》《直夜》《属疾》《霜月》《清风》《鹤》《萤》《灯夕寄内翰虢略公》《戊申年七夕》之类,大多反映了这些文学侍从之臣流连光景腐朽空虚的生活,是内容不十分健康的作品。

参与《西昆酬唱集》的17个人,其政治观点也是分歧很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就是上述对宋真宗祀神求仙、大兴土木这些问题。杨亿替宋真宗草拟东封(注:宋真宗亲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诏,原文有“不求神仙,不为奢侈”等语,宋真宗看了诏文草稿,就把这两句很重要的话删去了。可见杨亿是不赞成东封的,更不赞成大兴土木赶造无益于用的奢侈建筑。而丁谓等人却相反,他们拚命用这些来迎合真宗,以图取得高位厚禄。当时丁谓是权三司使,掌握国家财政大权,宋真宗想去封禅泰山,必然率领千乘万骑,一路州县供应,费用必定很大。真宗为此询问丁谓财政方面能否有办法,丁谓答曰“大计有余”,意即财政绰绰有余。这样,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就定下来了。单就此事,给国家浪费无数财富,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后来宋真宗又大兴土木,赶造宫观来祀神求仙,这些宫观的营造工程,也都

是丁谓等人撺掇而成的。如赶造玉清昭应宫,“料功须二十五年,谓(即丁谓)令以夜继昼,每绘一壁,给二烛,七年乃成”。丁谓还教唆皇帝,如果大臣出来反对,只要暗示这是为了求皇子——因为仁宗是大中祥符三年(1010)才出生,此时真宗尚未生子,帝位后继无人。大臣听了这个暗示,自然噤声不敢讲话了。丁谓等就是这样迎合帝王意旨,干尽坏事。所以当时张咏上疏宋真宗,有“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丁谓头以谢天下”的话,从实际情况来讲,这些话并不算是过激。

在第二个问题上,即对册立刘妃为皇后和后来真宗病重时决定皇帝死后由刘后以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个问题上,两派的分歧也很大。宋真宗很早就想立刘氏为皇后,被宰相李迪等反对作罢。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决定策立刘氏为皇后,命杨亿草拟文书,杨亿不愿奉诏。《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此事云:“及仪册皇后,上欲得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杨亿)难(注:反驳,责问对方)之。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后来真宗病危,杨亿还因为替宰相寇准草拟章奏,请皇太子监国,因而引起刘后的不满,所以使寇准远贬,而杨亿不久也忧病以死。可是丁谓却因拥立刘后,得参知政事之职,后来遂为宰相。钱惟演也依附丁谓,

并以妹嫁与刘后之兄刘美。真宗死，刘后以皇太后听政，钱惟演亦由枢密副使升为枢密使，后来官至节镇。由此可见，在上述问题上，这17个唱和诗人，如杨亿、张咏诸人，能深明大义，为民请命，并不愿意趋炎附势。而钱惟演，则能圆滑处世，巴结奉承，随俗俯仰，乖巧为人。

《西昆酬唱集》唱和诗人，标榜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这个诗派的诗篇，主要在近体诗方面，表现为音节铿锵，组织华丽，但由于雕采太甚，失之浮艳。还因为太注重摹拟李商隐了，因此吴枋《宜斋野乘》载葛常之《丹阳集》云：“小说载优人有以李义山（即李商隐）服蓝缕之衣而出，或问曰：‘先辈之衣何在？’曰：‘为馆中诸学士持（注：读xian，撕，取）将去矣。’人以为笑。”宋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名声鹊起，宋代诗体又是一变，西昆诗派遂衰落不振。到了清初，虞山（今江苏常熟）冯舒、冯班爱好李商隐诗，又开始注意到杨、刘等这个西昆派，并加以提倡。

《西昆酬唱集》，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北宋宝元二年（1039）刊本两部，元本两部，可惜今天都无法见到。明嘉靖玩珠堂刊本，即涵芬楼收入《四部丛刊》的这个底本，虽然明显的错字很多，但比起清代的刻本来，优点也很多。清初徐乾学得《西昆酬唱集》于毛奇龄处，加以刊行，因为刊刻

不精，所以不肯大量摹印流传。康熙戊子（1708），苏州朱俊升又加以摹刊，清《四库全书》即据朱本收入。其后又有壹是堂本、留香室本、浦城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邵武徐氏丛书本。清代诸本，大抵以朱俊升本为祖本，所有刊本，实际都从这个祖本转刻，并非有其他异本。《西昆酬唱集》向无注释，1980年12月始有《西昆酬唱集注》，王仲荦注释，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客观地评价钱惟演参与《西昆酬唱集》的情况，可以看到钱惟演主要的角色是酬和。钱惟演是西昆酬唱的中心人物，但很少当领袖的角色。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中，钱惟演诗的收入数量最少，一共47篇（杨亿66篇，刘筠62篇）。而且首唱只有7篇（杨亿44篇，刘筠12篇）。他首唱的诗少，抒怀的诗也少。只有在《小园秋夕》《霜月》两首中可以看出钱惟演在生活中的感慨。还有《南朝》等诗可以看见他怀念故国的感伤情绪。在《西昆酬唱集》的某些诗中，可以看到他对皇帝的歌颂和对权力的羡慕。

客观地评价钱惟演的政治立场，他一生都盼望晋升，想得到宰相的地位。他对自己在朝廷地位的高低很敏感。到了天禧四年（1020），杨亿再入翰林，诏令杨亿序班于钱惟演下，惟演言：“杨亿在景德中已为学士，今来官位与臣并是丞郎，伏乞圣慈特开杨亿班在臣之上。”（《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九)可以想像,钱惟演参加《西昆酬唱集》的时候,也一面尊重前辈,一面考虑到官位上下,自然而然地保持酬和者的态度。

从西昆酬唱最后一年大中祥符元年(1008)开始,真宗在王钦若、丁谓的怂恿下,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南谒亳州,大建玉清昭应宫。王钦若一派人通过这些投皇帝之所好的道教活动,一步步地向上爬。到了天禧四年(1020)六月真宗患病,寇准使杨亿草请太子监国表,欲让杨亿代替丁谓。所谋泄露,丁谓等力谗寇准,请求罢寇准政事。如上所述,这个时候对排除寇准,提拔丁谓起了重要作用的就是钱惟演。正当王钦若、丁谓一派跟当时的宰相寇准进行激烈的争夺权力斗争的时候,钱惟演站在了丁谓一边。这个时候钱惟演和杨亿在政治态度上有了明显的分歧。

钱惟演利用与显赫之家的联姻,来巩固了自己在朝廷的地位,上文已提及,钱惟演的妹妹嫁给了刘美。据《宋史》卷四六三《刘德传》,刘德是钱惟演妹妹生下的孩子,父亲刘美去世的天禧五年(1021)才十四岁。可知刘德出生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钱氏嫁给刘美是在景德四年(1007)以前。从这些资料可以知道,在西昆酬唱的时候,钱惟演为了巩固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已经开始与权势之家相结,后来和寇准、杨亿产生矛盾,这时已经埋下了

种子。西昆酬唱的时候,钱惟演的政治态度已经很微妙,钱惟演同一直与杨亿志同道合的刘筠不同,他的目的是自己的仕途顺利和钱家的兴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钱惟演自然避免得罪皇帝,必然和“性刚、频忤上旨”的杨亿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受到牵连。《西昆酬唱集》下卷与上卷比较起来,钱惟演参与西昆酬唱的次数减少了,很少参加具有政治讽刺性作品的唱和。可以说在西昆唱和的后半期,钱惟演的态度大不如前期积极。



注:钱惟演画像取自清代修《浙江吴越钱氏家谱》。

(作者为《临安市茶文化志》执行主编)



## 石樵与民国时期的《於潜县志》

郑明曙

除旅台乡人余烈的《於潜县志》外，於潜自光绪二十四年以来似乎就没有人修过县志。其实不然，抗战后，乡绅石樵就编修过一部《於潜县志》，可惜未曾付印成书。



石樵(1898—1962)，於潜棠公山(今观山村)人，字运山，又字蕴山。1915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和夏丏尊新派教员，与“五四”运动后浙江新文化运动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宣中华、徐白民为同班同

学。他为人忠诚，学业认真，思想激进，文笔出众，且喜研国学，博览群书，极有心得。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杭州各学校积极响应爱国运动。5月12日，3000多名学生集会游行声援北京。事后，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组成了杭州学生联合会。石樵以“一师”学生代表身份参加了杭州学联，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全市学生进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久，“一师”首届学生自治会成立，石樵当选为校自治会委员，担任文字宣传工作。1920年2月，“一师风潮”发生后，石樵被全体同学推为请愿代表之一，并负责宣言和请愿书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徐白民、宣中华、徐仁一起多次到省公署、省教育厅请愿，要求当局收回调离“一师”校长经亨颐的成命，以维持“一师”的改革精神。当斗争进入高潮，而经校长又坚决不愿继续留任时，石樵以灵活的斗争策略，说服同学改变了“非经不可”的要求，同意接受由愿意维持经亨颐革新精神的暨南大学教务长姜琦继任“一师”校长，从而保证了这场斗争

胜利结束。

1920年夏,石樵毕业回乡,后赴桐庐县立中心小学当教员。1926—1931年,傅调梅、曹孚有和石樵先后担任於潜县立第一小学校长。1928—1933年,石樵担任於潜县教育局局长、中国国民党於潜县党务指导委员。在此期间,赵堃曾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当局特务抓捕,石樵利用他在县党部任职的身份,以及赵堃曾是他的阿舅这层关系将他保释。1933年后,石樵曾担任安徽省第十行政专区(歙县地区)专员石国柱的秘书,抗战爆发后回於潜,被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主任金越光聘请为办事处秘书。1942年12月,在“浙西忠烈祠衣冠葬礼”(天目山公祭抗战烈士)万人大会上,石樵以省党部浙西办事处秘书的身份与国民军28军军部参谋长尹钦明、行署政务处处长林泽、於潜县县长沈时可作为主丧人,负责大殓到入葬的礼仪。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主祭,国民军28军军长陶柳、省党部浙西办事处主任金越光陪同,负责衣冠葬礼的大祭。

1940年10月,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石樵到潜川牧亭村(龙田头)租了方国庆的三间房子居住(此前石樵一直在於潜镇水沟巷租房居住,自己名下没有房产)。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大部分党政官员都去接收财产,并从中渔利。石樵看不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于是毅然弃官,回到牧亭

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后来,他了解到於潜近50年没有修过县志,为防历史资料湮没,主动到於潜县政府请纒编纂《於潜县志》。当时县政府虽然同意,但不拨经费,只给了五六担稻谷权作撰志开支。石樵并不计较,雇请了六七个有一定文化的人收集资料,其中有一个住在菜园巷的叫皮金国,年纪比石樵稍大。收集资料的人每个星期汇总一次,石樵自己则在牧亭埋头编纂志稿,十分专注投入,三餐吃饭都要家人叫。请堰口村的曹育三、方茂晏两人帮助誊清,经过三年多的潜心苦修,1949年初《於潜县志》终于脱稿。由于牧亭租房到期,石樵一家又从牧亭迁移到堰口大模(地名),租住在方秀夫家。当时正处在全国解放前夕,原本打算付梓印刷的《於潜县志》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於潜解放后,堰口乡政府知道石樵撰有县志志稿,于是派人以审查稿子的名义,向石樵要走了一部分稿件。

石樵家在解放前拥有20几亩土地,其中有10多亩在棠公山。土地改革划分成分时,石樵家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当时政策,属于小土地出租的,允许自行选择在什么地方参加土改、保留哪些土地。因此,石樵选择在棠公山参加土改。于是,1951年石樵家就又从堰口搬到棠公山,当时满满两木箱的志稿及资料也随他搬去了棠公山,珍藏于家中。

1952年,石樵因历史问题遭逮捕。始被判决死缓,后改判15年。当时县公安局的人又以审查的名义,到石樵家向他妻子要走了一部分志稿。此后,於潜县各部门经常有人去他家里要县志稿。石樵的妻子吴慧(小名根娣,是石樵的后妻。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曾在谷仓和於潜县高等小学任教。大女儿出生后,她辞职在家带小孩),因家庭成分不好不敢推辞,最后只能和盘托出,将现存的志稿材料全部拿出来交给了他们。据吴慧后来回忆,最后一批志稿材料是当时於潜县文化馆的人拿去的。至此,石樵编纂的志稿全部散佚。1957年8月,石樵提前释放。那天他回到家中已是傍晚,饭菜已摆上桌,他一到家,全家自然高兴万分。吴慧先端上了一壶茶,然后又进厨房为石樵加了一个菜,算是为他洗尘。刚要吃饭,他突然问妻子:“我那些县志的稿子还在不?”吴慧说:“已经全部被拿走了。”石樵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我三年多的心血白费了!”接着又说,“以后,於潜县的历史再也无从考证了。”

坐在一旁的儿子石士衡当时已初中毕业,见父亲这么伤感,安慰他说:“县志以后总有人再写的。”石樵答:“写是可能有人写,但这么齐的资料再也没有了,都在我这里了。”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难过得连那餐晚饭都没有吃。

这些情况,是笔者在2017年与人去采访赵堃烈士后人的时候,石樵的儿子石士衡说的。赵堃烈士的姐姐是石樵的前妻(因病早亡无子),按辈分排起来石士衡叫赵堃娘舅。石樵曾两次救过赵堃的命,他的减刑,是否跟他保释赵堃有关不得而知。石士衡还告诉我,他父亲从小工书法(米襄阳风格),写得一手好字。减刑回来时,石士衡好几次想叫他写几个字留下来。可惜因他患青光眼,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了,根本无法握笔写字。加上《於潜县志》已被人拿光,石樵的亲笔字一个也没有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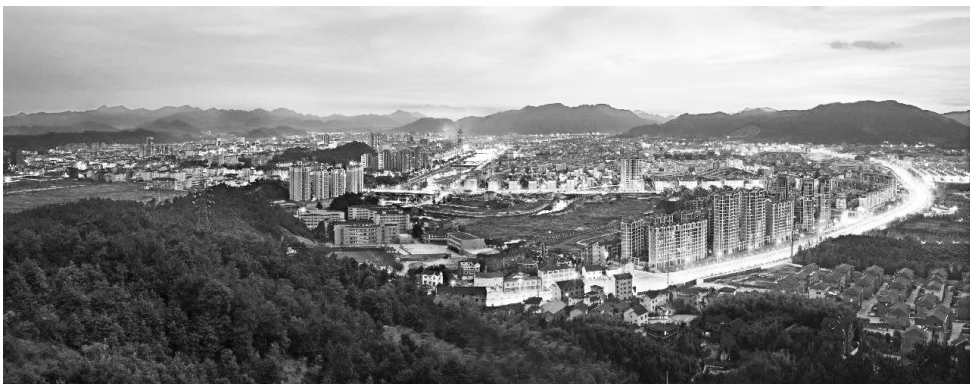
说来也巧。2019年6月的一天,区地方志办公室(现区地方志研究室)的唐剑平,打电话给笔者,叫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去他办公室一趟,说是地方志办公室搬迁新址,在理东西时发现了民国时期《於潜县志》的部分手抄本资料,要我过去看一下。我去看了以后,果然发现有许多用毛笔小楷抄写的县志材料。看上去有一人的字体十分漂亮,明显是临过贴的。于是我就联想到石樵曾经编纂过县志,字也写得很好,这些资料是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带着问号,我将这些志稿的扫描件拿去让石士衡辨认。石士衡一眼就认出了他父亲的字体,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告诉我:“几十年来总想看看我父亲的字,倒是你帮我圆了这个梦。真的谢谢,谢谢了!”

石士衡还告诉我,这可能就是原来县文化馆保存下来的部分志稿。他说,1980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他是大队(村)的普查员之一。有一次开会,他与原於潜县文化馆馆长张遵文碰到了一起,张遵文与石士衡原本就认识,碰到一起谈起他父亲以前修县志的事。张遵文说,1956年2月,他调到於潜县文化馆当馆长,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包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些手写稿。当时没有注意,就随便把它塞在了办公室的柜子上面。过了一段时间,出于好奇,他又将那包东西拿出来仔细翻了翻,这才发觉是《於潜县志》稿,感觉是好东西,于是重新包好把它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里,还上了锁。后来知道是石樵写的。但在那个特殊年

代,也不便声张。1957年后,他调去於潜中学当副校长,对这些县志稿不放心,就拿回去放在了他自己家里。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他认为放在家里也不一定安全,于是将那包材料送去临安,交给了当时的县档案馆。

根据张遵文的说法,这次在区地方志研究室发现的部分《於潜县志》稿,极有可能就是他“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交给县档案馆的那些资料。查阅1992年出版的《临安县志》,许多材料与石樵的志稿相吻合,想必在编修1992年出版的《临安县志》时,石樵的志稿材料已被收集利用。若是这个结论成立,石樵的初衷已经得以实现,他的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作者为《於潜镇志》主编)



##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区委党史研究室

在中共中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系统梳理各历史时期创造的伟大成就,总结提炼伟大建党精神,殷切提出“九个必须”,豪迈发出新时代中央号召。讲话以史为据,立足人民情怀,读来令人振奋、激情满怀。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历史是现实的映照,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对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百年只是宏伟事业的开始,只是威武雄壮活剧的开幕。作为临安主管历史的部门,区委党史研究室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仰,立足岗位,扎实工作,

勇于创新,以更多更优秀的成果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继续服务党史学习教育**

习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重要成员单位,区委党史研究室坚持“党史姓党”的政治原则,发挥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全方位服务全区党史学习教育。紧扣主题主线,把丰富厚重的临安党史转化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基础教材。开展《红韵天目——临安党史大事记》主题图片展,出版《初心如磐——临安区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协助负责《临安党史教育简明读本》的编写出版,拍摄《天目长歌——党在临安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纪录片,以鲜活翔实的史实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继续赓续红色根脉**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源和本、根和魂。正是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核心的各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谱系感召下,广大共产党员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在临安这片红色热土上,先后涌现出邹子侃、来学照、傅玉成、骆耕漠、阮迪民等为代表的临安籍优秀儿女,也发生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侯头之战、红军皖浙赣独立团攻占昌化、《民族日报》的创办、周恩来西天目山之行、粟裕指挥的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等重大红色事件。这些革命人物和革命事件,在天目大地留下了大量的红色遗址遗迹,成为临安红色历史文化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信仰高地。区委党史研究室在对红色资源开展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确定了10个党史学习教育实践点,并以此形成5条红色研学线路。启动红色资源档案库建设,制作《临安区红色VR全景“地图”》,为学习临安区红色历史、弘扬红色精神提供宝贵的线路图,也为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提供地理信息参考,切实为全区保护红色遗产、守护红色根脉夯实基础。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站稳人民立场,继续为群众办实事**

习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区委党史研究室注重把推动工作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把落脚点与服务于民结合起来。根据部门镇街需要,党史研究室主动作为,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的热潮中去。通过深挖红色资源和地方志资源,帮助相关镇街建造天目抗战纪念馆、中共於分昌中心领导小组纪念馆、昌化红色记忆馆等纪念场所,协助打造红色旅游线路,形成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产业链。开展“百场影片忆征程”红色电影下乡活动,精心挑选《红星照耀中国》《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等优秀国产影片到农村放映,丰富村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组建党史宣讲团,走进学校、社区、企业、机关,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全面宣传党的历史,激起大家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学习热情。开展党史书籍送上门、走访探望老党员、圆梦孩子微心愿等活动,推动党史知识全面普及,体现组织的温暖和关怀。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区委党史研究室将继续深入研究党的历史,整合全区党史资源,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为建设“城西科创新城·美丽幸福临安”贡献强劲史志力量。

## 浅谈修志资料的收集

——以二轮《萧山市志》经济部类编写为例

金雄波

“资料收集难度大”是第二轮市县志编纂工作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之一。<sup>①</sup>目前,有些已出版的志书或正在编写的志书,由于资料难以收集齐全,因此记述的资料不全面、不系统,影响志书功能的发挥,难以经世致用。《萧山市志》经济部类收集文字资料近500万字、照片800余幅,基本满足记述经济部类内容的需要,做到资料全面、系统,以《萧山市志》经济部类编写为例,谈谈二轮修志资料的收集,抛砖引玉。

### 一、资料收集的难点

《萧山市志》的上限是1985年,下限是“撤市设区”的2001年3月25日。其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不断深化,由农村推向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府行政管理经济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由微观为主向宏观为主转变,管理的范围缩小,统计的经济指标更加注重宏观性;行政管理部门撤并和职能的

调整,改变了原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格局,经济组织由单一公有制向多种经济类型转变,使资料难以收集。《萧山市志》经济部类资料收集的难点,主要是以下4个方面:

### (一)无部门管理的企业资料难收集

萧山的个体户、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无部门管理的经济类型企业有3.3万余家。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先后撤并国营工业总公司、二轻工业总公司、商业局、物资局和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等,4000余家国营、集体企业(除乡镇集体企业外)又成了新的无部门管理的企业。按照职能分工,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的资料都分散于经济发展局、发展和改革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物价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统计局、审计局等行政管理部门。这些无部门管理的企业,不但资料收集难,而且编写志书的工作难落实,只有经济组编

<sup>①</sup>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第二轮市县志编纂经验交流性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办字[2006]36号),2006年12月19日。

辑人员负责收集资料、编写志书。

## （二）遗失的资料难追回

丢失资料的原因主要是3个方面：一是在单位迁址、撤并时，没能及时将全部档案搬迁或移交，导致资料遗失，其中遗失的具体资料尤其多。二是单位办事人没有将资料及时交文书归档，使资料遗失。三是单位没有按规定对文书档案进行整理存档，造成资料的遗失。如某单位多年来不将本单位印发的文件存档，甚至连“计划”这样重要的文件都不例外，使原始“计划”文件丢失。现在编写志书时，只在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会议文件汇编》中，才找到部分“计划”文件。又如萧山市自1988年开始举办的全市性“产品展销会”，直到今日还找不到1988、1989年两年的“产品展销会”原始资料。所以，丢失的资料，再想追回难度很大，有绝大部分资料根本找不回来。

## （三）连续性的经济指标难寻找

《萧山市志》上下限时段内，国家统计局和专业部门的经济统计指标变化频繁，使记述的经济发展指标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如《萧山统计年鉴》中统计的1985年工业行业按门类分，1986年后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1993年调整分类行业，缝纫工业、皮革皮毛及其制品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分别改为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业、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又如《萧山统计年鉴》有1985—1992年期间的服务网点及从业人员统计情况，1993年后无此统计；1985—1997年有商业（1993年改贸易业）、饮食业（1993年改餐饮业）网点及从业人员统计情况，1998年后又无此统计；1985—1992年，有统计全年萧山粮食、油脂销售数量，1993年后改为统计限额以上企业粮食、油脂销售数量。其间，统计经济指标的变化，使连续性的经济指标难寻找，记述的事物缺乏全面、系统反映历史与现状的统计指标。

## （四）无形的资料难收集

无形的资料，即“活”资料，包括人的思想、理念，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前景等事物的看法、想法，对政府制订的政策、采取的措施的认同、理解等。二轮修志注重思想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第二轮市县志编纂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办字[2006]36号）中指出，二轮修志内容应“注意记述‘人’，反映‘人’”，所以全面、系统地记述人的“活”资料，成为二轮修志的重要内容。可是收集无形的“活”资料十分困难。

## 二、资料收集的要点

资料收集是编写志书的基础工作。根据《萧山市志》编辑部对资料收集务必做到“资料全面、系统”的要求，经济部类编写人员，采用“一问一答”



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随着志书编纂工作的进程,修改纲目、收集补充资料。经济部类编写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共收集文字资料近500万字、照片800余幅,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

### (一)收集资料的要求

收集的资料要全面、系统。志书“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编纂体例,决定了收集的资料必须做到全面、系统,使编纂的志书“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对曾经行使某项管理职能的单位,要求提供行使管理职能期间的档案资料或编写志稿。对难以落实撰稿单位的纲目,如《私营工业》《联营工业》《股份合作制工业》《股份制工业》《资产管理》《管理模式》《企业文化》《证券》等节内容,由经济组安排编辑收集资料、编写志稿。

经济部类编写人员在收集本单位资料的同时,还要收集萧山行政区域相关的资料;不仅收集文字资料,而且收集实物资料、口碑资料;不仅收集反映事物的发生时间、发展变化、现状和终点等发展全过程的资料,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色的新事物的资料,而且收集能反映事物的发生背景、变化原因、因果关系、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措施等资料。如《金融》编写组编写的《国债》节,不仅收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料,而且收集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及与之相关的资料。收集的资料有办理国债发行、兑付、转让的机构和

发行国债的期限、利率、数量、种类、对象及国债兑付金额、转让成交金额等,使《国债》节内容丰富,资料全面、系统。

### (二)资料收集的方式

经济部类收集资料,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即根据每一条纲目所要记述的内容,有针对性地收集纲目所需要的资料。同时,采用“采编合一”的方式,即按照编写纲目分工,由纲目编写人员采集资料。

首先,由撰稿单位制定收集资料提纲。制定了收集资料的提纲后,使收集资料做到心中有数,不盲目从事,资料收集工作有条不紊,收集到了更多有用的资料。萧山区人民政府于2003年9月25日印发《关于〈萧山市志〉撰稿分工方案的通知》,落实撰稿单位及撰稿任务,并确定牵头部门。各单位对承担撰稿的纲目进行再细分,细分后的纲目作为撰稿单位收集资料的提纲。

其次,随着编纂工作的进展,不断修改完善纲目、收集补充资料。(1)编写志稿阶段。《萧山市志》编辑部对《撰稿分工方案》的纲目进行修改,并分别于2005年4月、2006年10月印发《萧山市志》纲目(二稿、三稿)。对二稿、三稿修改补充的纲目,由各组落实撰稿单位,进行对资料的补充收集。(2)志稿分纂阶段。在各部分初稿撰写任务完成后即进行分纂工作。为确保分纂

质量,各组之间进行了横向联系、经常沟通,主要解决内容重复记述的问题,再一次对纲目进行修改。根据修改的纲目,承担撰稿任务的单位也再一次收集补充资料。(3)总纂阶段。在总纂过程中,对需要继续补充的资料,由各组落实撰稿单位进行收集,包括文字资料的补充和照片的调换、补充。

### (三)资料收集的途径

经济部类编写人员广泛、深入地收集资料,收集的文字资料共计500万字、照片800余幅,基本满足了经济部类编写的需求。收集了《萧山年鉴》和统计局编印的《萧山统计年鉴》等资料,还收集了档案、报刊杂志、地方志书、亲身经历人和专题调查中的资料。

1.档案。档案资料是编纂志书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经济部类收集的档案资料,主要包含档案馆档案、主管部门档案和企业档案的资料。档案馆档案有查阅档案馆卷宗资料 and 通过电脑查阅“杭州市萧山区数字档案”的资料两个方面。如收集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萧山工业企业普查结果的资料,在统计局的档案中,只有萧山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86年12月编印的《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萧山县工业企业概况》。后来在萧山区档案馆查到了“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的卷宗,在卷宗中有汇总了的“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及数据”、“工业企业固定合同制职工情况”等,使记述的第二次全国

工业普查萧山县工业企业有了普查的结果。数字档案主要查阅了党委、政府印发的各种文件名称和内容及文件号,使记述的文件有文件名称和文件号,便于今后读者查证;同时,补充文件主要内容,作为记述事物发生、发展的背景资料。通过查阅《萧山市年度统计报表》,寻找之前年度的连续性经济指标,以求统计经济指标的前后统一。

2.报刊杂志。报刊杂志中,有不少是历史活动的当时记录,而且时间、地点较为准确。查阅了1985—2000年期间,党委、政府及部门创办的《萧山农科报》《萧山经济报》《萧山报》《萧山日报》《萧山商业经济》《萧山工商》等报刊杂志。通过查阅报纸,查到文字资料126条,其中补充事物发端时间的资料6条、补充事物发展变化原因的资料9条、补充事物发展过程的资料77条、补充事物发展结果的资料7条、补充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背景资料8条、纠正差错19条。

3.地方志书。地方志书的资料可靠性相对较高,记述事物的内容较为具体,而且基本上可以查到经济部类记述的绝大多数事物的发端时间和部分事物发展过程的资料。查阅的地方志书,主要有部门和乡镇编写的部门志、专业志和乡镇志。如从萧山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8月、2002年9月编印的两部《萧山工商行政管理志》



中,查到了萧山最早核准注册的企业和商标等内容及2000年后各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状况。通过收集地方志书的资料,使编写的经济部类内容“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

4. 亲身经历人。亲身经历人对发生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比较清楚。为了解私营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专访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担任不同社会职务和不同创业时间、不同企业规模、不同从事行业的4位私营工业企业创始人(董事长),了解了创业目的、资金筹集、最大困难、人才引进、决策程序、工资分配等情况,并整理成《萧山私营工业企业创始人访谈录》;为了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乡镇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请鲁冠球谈“万向”发展、黄来兴谈“亚太”发展、邵伟成谈“浪潮”兴衰、俞柏明谈“三江”兴衰;国营工业总公司国有资产承包、手工造纸及操作工序和萧山劳务输出等情况,都是通过亲身经历人才了解清楚,从而弥补了经济行政管理部门不管理、不掌握和遗失的资料。

5. 专题调查。选择专题进行调查,是《萧山市志》二轮修志收集、整理资料工作的核心。为了解私营企业管理模式,选择萧山私营工业企业的中等发展镇进行专题调查,并把了解到的情况记述在志书行文中;专题调查乡镇集体企业持续发展或由兴旺到衰

落的原因,由4位经营者谈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并将谈话整理成《萧山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经营者谈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作为“附”录入志书;还专题调查了工业企业职工报酬、萧山“菜篮子”工程、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业、偷骗逃国家税收案件、广告制作等。通过专题调查,不仅使所记事物的内容更加全面、系统,而且对存史、资政、育人人都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 (四)资料分类的方法

首先,按纲目进行分类,将收集的资料按纲目类别进行逐级分类,至最后层次的编写单元止。第二,按时间分类,将纲目分类后的每一类资料,按资料所属的年代或年份,逐年排列,至下限年份止。资料通过上述分类后,分别按纲目顺序、时间顺序编列序号。

对收集的地方志书、报刊杂志和照片等资料,也按上述方法进行分类并编列序号,便于资料的保管、查阅和核对。

#### 三、资料的考证

收集的资料,经济部类编写人员都进行了逐一考证,多方印证,鉴别真伪,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经考证,差错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收集的史料原本是错的或是虚假的;二是收集的史料属非正式文件或未定稿的文书资料;三是收集的虽是正式文件或定稿的文书资料却有不准确或不真实之处。经济部类编写人员考证资料的

方法,主要采用书证、物证和人证三种方法。

**(一)书证。**是文献证文献的考证方法,将同一事物的不同文献资料进行对照比较,从中求得准确或接近准确的结论或意见。主要采用地方志书中记载的资料进行考证。如编写人员查到1987年版《萧山县志》记载的“民国12年(1923)秋,由沪商徐方卿辗展传入本县坎山镇,首批习艺者仅24人。”这里记述了“萧山花边”的起源时间是民国12年(1923)。后在资料考证时,在1987年编印的《萧山县二轻工业志》和2003年编印的《坎山镇志》两部志书中查到,记载的“萧山花边”的起源时间都是民国8年(1919年)。《萧山县二轻工业志》记载:“民国8年(1919年),沪商徐方卿辗转传入我县坎山镇。首批习艺者仅只二十四名女工。”《坎山镇志》记载:“民国8年(1919年)农历8月16日,上海商人徐方卿……,率领天主教徒4名从上海徐家汇来坎,首批组织24名女工学习挑织花边。”编写组几经对比后认为,《萧山县二轻工业志》和《坎山镇志》所记述的民国8年(1919年)值得采信:一坎山镇是“萧山花边”的起源地,记载的资料详细而具体;二《萧山县二轻工业志》记述的“萧山花边”始于民国8年(1919年),是经当时的一名挑花女工证实的。因此“萧山花边”的起源时间确定为民国8年(1919年)。又如县物价委员会成立

时间,编写人员亦在1987年版《萧山县志》中,收集到成立时间为1959年。但在后来考证资料时,查到《萧山县物价志》中记载:1957年7月成立萧山县物价委员会,并有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等。同时,还记载:1959年8月8日,县委、县人委调整县物价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并有领导班子成员名单。编写组人员一致意见认为,1957年7月成立萧山县物价委员会是可信的。

**(二)物证。**采用物证方法考证资料比较可靠。经济部类编写组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物证:(1)照片。如最初查到资料,“1989年12月,开始对符合会计从业条件的人员发放会计证和临时会计证。”考证资料时,与1990年12月20日拍摄发放会计证会议的会场照片相对比。会场照片中的横幅是:“萧山市首批会计证发证会议”,而且照片背书记录了:“萧山市会计证发证会议上,首批发证的单位有农场局农业局卫生局国营工业总公司等。”后又经参加会议人员证实,萧山市首批会计证发证时间是1990年12月20日。从而纠正了原来资料的差错。又如通过查阅《萧山日报》的版面,纠正了原收集的《萧山日报》版面设置及版面改版时间的差错。(2)档案。如“企业简介”,各编写组在查证企业收集的资料时,都采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企业注册登记、登记变更的档案资料,理清企业成立及沿革情况;采用企业财务部

门存档资料列出历年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实现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及数值,使记述的数据真实、企业发展脉络清晰。又如戴村镇马谷村陈某反映:“他家于1983年4月12日安装了萧山县农村首部私人电话,并说《萧山日报》报道了此消息并刊登了他在接听电话的照片。”而且已将这资料记述在《戴村镇志》中。在考证这资料时,首先查阅《萧山日报》。其实《萧山日报》已于1961年2月1日停刊,后续的《萧山农科报》1983年6月1日才创刊。接着调查电话安装人。电话安装人说:“我为陈某安装的电话是大队的同线电话,并不是为他直接安装私人电话。”后在原萧山邮政局的档案中查到:1983年,全县农村安装了私人电话2部,6月14日义盛人民公社徐某家用电器修理户安装了萧山解放以来农村首部私人电话。通过档案资料,将差错进行了纠正。(3)报纸。如萧山人行编写人员起初收集到“1990年7月,萧山中行在辖内首次发行长城信用卡。”通过报纸查实,不是“发行”而是“代发”。后又经萧山中行最终确认,1994年6月的《萧山日报》记载:“1994年6月8日,萧山中行开始办理自发长城信用卡业务。”又如《工业》编编写人员最初查到“1995年末,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基本实现劳动合同制”的资料。后在资料考证中,查到1996年4月的《萧山日报》记载:“前日,召开全市乡

镇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作会议,争取6月底前基本完成。”说明最初查到的“1995年末,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基本实现劳动合同制”的资料有误。

**(三)人证。**以口碑资料来印证、纠正文献资料或实物资料。这种口碑资料的考证方法,需要多人的口碑为依据。如编写人员收集到电视台技术人员正在铺设光缆的照片,其时间、地点与收集到的《电视》章收集的文字资料相似。在考证此照片时,发现照片中人员的着装有异,于是向照片的摄影者咨询,请电信、电视部门辨认照片。查后证实,该照片系电信工人在抢修被过路车辆拖倒的通信电缆,而不是电视台技术人员正在铺设光缆的照片。又如《工业》编编写人员在企业收集到一张承接三峡工程项目的照片。在考证照片说明的几种要素时,向三峡工程项目的建设者辨认照片地点,向该照片拍摄者辨证及查对笔记,纠正了照片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和工程完工时间。

#### 四、资料的选择

收集的资料经考证、核实后,必须对资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认真选择合理的资料,以确保志书质量。

##### (一)资料选择的原则

经济部类编写选用资料坚持以下5个原则:一删掉不全面、不系统的零星资料和事物要素不齐的资料;二选择准确、真实的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

资料；三选择表达观点需要的资料；四选择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典型资料；五选择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点的资料。

## （二）统计数据的选择

在经济部类编写收集的统计数据中，部门之间统计数据不一致的情况较多，产生的原因很多。以工业统计为例，部门之间统计数据不一致的情况，主要原因是3个方面：（1）统计计算方法不同。如工业总产值有不变价、现行价，而工业总产值统计数据未注明是不变价、还是现行价。（2）统计口径范围不同。统计部门统计的企业，1997年前统计的是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8年后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而专业部门和主管部门统计的工业企业不受以上限制。（3）统计方法不同。如统计局提供的企业数与工商局提供的企业数不同，统计局汇总上报统计报表的企业数，1985—1994年由集团公司等建立母子关系的工业企业合并会计报表后，由集团公司（母企业）向统计局报送报表，使统计局统计的工业企业数少于工商局的登记在册数；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后，按独立核算企业报送报表，不再按集团公司（母企业）合并会计报表报送，使统计局统计的工业企业数多于工商局的登记在册数；1998年后，统计局统计

的私有工业企业数包含无证经营个体工业户。部门之间统计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其他原因还有指标含义不同、行业划分不同、行政区域不同和调查方法不同等。

经济部类编写人员对于部门间提供统计数据不同的情况，首先作具体分析，查找统计数据不同的原因，调整和规范统计指标；然后，按照“统计数据一律采用国家统计局部门的数据，统计部门没有的采用专业部门数据”的原则，选择国家统计局部门的数据或采用专业部门数据；最后，在采用不同部门提供的同一统计指标不同数据时，必须对相关统计指标进行加注，说明统计资料的来源和统计指标统计的行政区域、口径范围、调查方法、统计方法和计算方法等，不但能提高志书的品位，而且不会使读者产生疑惑。

## （三）照片的选择

对选用的照片，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即坚持不用不清晰的照片，清晰的照片也把握符合思想性、注意艺术性、讲究代表性、寓有说明性和具有存史价值5个方面。同时，选用的照片，必须做到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者姓名或提供照片单位等要素齐全。

（作者为《萧山市志》副主编）

## 从“七一”重要讲话中汲取开创未来的奋进力量

颜 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光辉历史、擘画光明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内在逻辑和核心要义,明确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主题目标、基础条件、路径要求和精神状态,切实把学习成果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不竭动力。

### 明确开创未来的主题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七一”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贯通历史、现实、未来,贯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一个目标、一条主线,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

创造,归结起来,都是围绕这个主题。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虽然在内涵上不完全等同,但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党的十九大作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明确开创未来的基础条件:四个历史时期及其伟大成就

“七一”重要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百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伟大成就。



从党的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转折,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 明确开创未来的路径要求:“九个必须”

“七一”重要讲话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鲜明提出“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九个必须”揭示了过去我们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党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既是百年光辉历程的经验总结和成功启示,也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路径取向和根本要求。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这“九个必须”,将其贯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方方面面,贯穿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中,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 明确开创未来的精神状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凝练提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

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继承了伟大建党精神,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代中国共产党员身上

得到传承。

正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坚守与践行、光大与发扬,让我们党创造了人间奇迹,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世界。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作者为中共临安区委党校科研科科长)



## 我的战斗历程

采访对象：姜世殿，1924年出生，山东牟平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民兵组织，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参军，曾任副班长、班长、排长、指导员等职。1957年转业到公安系统工作，1979年后任临安知青家具厂党支部书记、临安电扇厂党支部副书记、县殡葬管理所所长等职。

### 一

我于1924年7月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第五区张家圈乡孔家村。爷爷因给别人做借钱担保，欠下了沉重的债务，全家一起吃苦还债，如果有5升粮食收成，4升要卖掉用于还债，所以生活非常清苦。我家的粮食可以说一年到头番薯当家，重要时节，才做顿馒头，比如，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的时候，我能吃到一两餐馒头；过年时，用番薯粉和青菜、豆腐包顿无油饺子，大年初一把馒头切成片，每人能吃上一两片，最多吃三片。记得有种可以生吃的野菜，全家从春天一直吃到7月，直到野菜老了不能吃了。

8岁时，我开始在村里的私塾读书。我天天背《三字经》《百家姓》等，经常被老师用戒尺打得手肿。因家里

劳动任务太多，我半年后就没学上了，在家背着筐子捡马粪、割猪草、拾柴火等。10岁时去英国人办的一个养蚕学校上学。我被安排在高年级班，老师不教我，全靠高年级学生教我认字，稀里糊涂地上了一年。接着到离本村5里路的口子村小学读书，仍上一年级。我这才有了一年正规的学习，成绩较好。第一个学期期末考，我得了班级第一名，可奖励4吊铜板。而同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考了倒数第一，校长让我与他对调成绩，我哭了。校长说：“你不要哭，铜板给你，但放榜时你的成绩倒数第一。”第二个学期期末，我得了全班第二名，但放榜时我仍倒数第一，只是3吊铜板归我。上二年级时，我要照顾弟弟、妹妹，捡马粪、拔猪草，家里的活太多，没时间学习，两个学期期末分别考了第四名、第三名，都没有奖励。后来我就不上学了。

曲家口村里来了一支国民党的游击队，指挥部设在离孔家村5里外的地方，有个头目要找个照顾小孩的人。我家生活太困难，我堂叔的姐姐介绍我去干了3个月，每月5块钱。但头目很凶，我实在吃不消。听说宋家口村可以淘金，我就跟着别人去了。约一

个月后淘到了金子,日本佬却打过来了,地主老板的淘金队解散。我没拿到一分钱,只得回家。接着在我爷爷熟人开的客栈里烧水打杂,对方只管饭。约5个月后遇到了宫老师。他让我不要干了,回家为好。我说:“如果不干,没饭吃啊。”宫老师说:“过几天我领你去一个地方,大家人人平等,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我问:“哪里有这样的好地方?”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你也不要告诉别人,先回家等我。”我回家等了好几天,没见他来找我。后来有同学告诉我,宫老师带了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去延安了。而我仍然在家种地。

第二年春天,堂伯父的儿子要去东北干活,母亲希望他把我带去找个活做。我们到烟台待了几个月,亲戚帮我找了份磨坊的工作。而后我们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到哈尔滨。一个月后我去饶河,在堂伯父家的杂货店当学徒。第三年时,日本人把饶河县城的青年人集中起来,进行了3个月的军事训练,再选出一批人到伪满洲国军队里当兵。我伯父觉得情况不对,对我说:“你回家为好,否则不知道被抽到哪里当兵,我们不能当亡国奴,不能当汉奸,你赶快回家。”伯父给我编了要回家结婚的理由,让我跟着堂兄嫂子回山东老家。

回家半个多月后,我到烟台另一伯父的小店里当营业员。不到一年时

间,这个小店被日本鬼子和汉奸盯上了,天天来拿东西却从不给钱,小店不得不关门了事。我又到一个修车厂当学徒,每月3块钱。干了不到3个月,我发现老板的弟弟是个专为日本鬼子服务的特务,一天到晚枪不离身。于是,我就回家了。

就这样,为了活下去,为了有口饭吃,我到处奔波。从山东到东北,从农村到城市,我目睹了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困苦,也找不到自己生活的出路。

## 二

回家时,村里已经建立了抗日民兵组织,而且有几个地下党员,我成了村里的民兵。

因为我对烟台比较熟悉,有一天,村里民兵队的负责人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推着独轮车到烟台去带回两捆席子,半路上有人接应我。我在烟台住了一夜,返回时,到离烟台30多里路的十六里头村,来了两个人,让我把席子留下,之后我就推空车回家了。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又有一次,组织上让我到烟台去推回一车大粪,在同一地点交接。其实粪桶上部装大粪,下部装的是步枪子弹,只是当时我不知道。那次任务我也完成得很好。我执行了五六次这样的任务,村里民兵队的负责人担心我暴露,对我说:“这个活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有危险了。”



村里有个叫王彪(即曲政礼,村里唯一一户姓曲的)的人经常白天休息,晚上出去活动,大家也不知道他干什么。有一次,有人安排我跟王彪到牟平东关去。我问去干什么事,他说不用管,只要眼睛灵敏就行。去了后才知道,离东关不远处有个日本鬼子的据点,我的任务是在离据点约100米的地方监视鬼子的活动。如果鬼子出来得比较多,就赶紧报告。一段时间后,我得知王彪是区里锄奸队的队长。锄奸队杀了好多个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卖命的铁杆伪保长。

1945年2月,王彪说锄奸队将要解散了,你们回各自村的民兵队。8月,日本鬼子投降,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地方政府可以公开挂牌子,民兵可以公开训练了。

1946年12月,村党支部书记姜庆家带了一本小册子,把我叫到村外的一座山上谈了一次话,内容很多。他说:“马瘦毛长耷拉鬃,穷人说话没人听。穷人组织一条心,要想翻身去找毛泽东。”大概在12月18日,我到区委所在地莒格庄开会。会后,区委书记姜温到我身旁,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叫出去谈话。他问我:“你参加共产党好不好?”我随口说了句话:“参加共产党不是要被杀头的吗?”他说:“那是国民党杀我们的头,共产党怎么会杀害自己的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参加共产党好不好?”我说:“你说好,

那就是好。你不怕死,我就不怕死!只要领导不怕死,我们普通老百姓怕什么死不死的,我参加!”我让姜温书记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要我另找两位,说他不能介绍我,否则就成拉帮结派了。后来村党支部书记姜庆家和组织委员姜庆利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1946年12月下旬,我填了入党申请表,写上我的简历和入党的决心,交给姜庆利。1947年正月初八,区委就批准我入党了。

1947年春,县里开劳模大会,有全县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县委书记说:“国民党反动派要进攻延安,我们要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就要参加解放军,不怕死的参加解放军。”他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我见会场一点声音也没有,就站起来振臂一呼:“我参加解放军!我们村不怕死的站起来,一道参加解放军!”当时,孔家村有七八个人立即站起来要求参加解放军。各村青年人的积极性都很高,整个会场中站起来的有100多人,并且现场签名。

第二天回到村里,村干部继续动员民兵参军。孔家村一共有12个人报名参军。农历二月初二,村里把最好的牲口集中起来,让我们戴着大红花、骑着牲口到区里集中。从区里到县里报到,一路上同样骑着马、戴着大红花。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莱阳。当时华东军区司令部就在那里。



我们报到后就穿上了新军装。

新兵连队训练时,来了几位陌生的干部,让我们当中会开车、修车的站出来。我修过汽车,就说:“我不会开汽车,但修车的活干过近3个月。”旁边一位年纪大的人说:“好,你算一个。”我办了手续,拿着党员介绍信到机械修理处报到。学习了一个星期,一部分人先走了,我们又继续学习了一个星期。

有一天,我们得到通知,每人拿一把铁锹、一个筐子去执行任务。原来是到一片树林旁边,挖坑后把十几辆拖拉机用油布包好埋起来,上面盖砂土、草、树枝,以防被敌人发现。晚上回来时,保卫科科长召集我们开会,让我们拿着党员介绍信回原单位。我到通信营去报到。连长、排长、司务长都在,新兵已经下部队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刚回来的战士。我成为新兵营第一营一连通信班战士。通信班有3支枪,每支枪5发子弹(由排长保管)。

1947年8月,国民党军范汉杰部派出大军向胶东腹地逼近。解放军部队转移,保卫科到通信班找人,说要党员、要不怕死的,去完成一个任务。我出来当兵就没打算回去,立即跟着去了。

我到了保卫科,才知是让我们十几个人分别在三个地方烧掉一批文件,要把文件烧到看不见字为止。我们背着背包,烧了一半,听到迫击炮声

响了。科长要求加快速度,因为国民党军已到村头,离这里不到一里路了。一会儿又报告,敌人离这里不到半里路了,且我们已无法从前门撤退。我们立即把剩下的文件放到包里,用凳子砸开后边的窗户,爬出去后跑步到了一片梨树林。分头执行烧文件任务的十多人集中起来,科长让我们检查一下文件还剩多少,并说文件绝对不能丢,按照约定的路线去追赶部队。到碗底村时,我们终于把文件全部烧掉了。

我们从莱阳到了海阳,住了一段时间,我由战士提拔为副班长。10月底,部队向南行进,到高密地区大释山村驻防。

解放军包围了高密,城内敌军的补给不得不依靠空投。好多降落伞被大风一吹,落到了城外。营长鲜元石是位老红军,说大家准备好,不要背背包,每个人都把背包带解下来,国民党送礼来了,我们去捡东西。我找到了四包轻的,还有一包很重。我找了块石头把木箱子砸开,发现里面是一盒盒的步枪子弹。这个箱子很重,扔掉却太可惜。罐头、饼干这些好吃的东西我就都不要了,背着这一箱子子弹交到了营部。11月27日,高密解放。不久,我调到另一个班担任班长。

过沂河时遇上大冷天,而且河水漫到大腿。我所在的排里有许多十四五岁的小战士,我的班里12个战士中

就有8个是小战士。我把鞋子和棉裤脱掉后挂在脖子上,让他们骑在我的肩膀上过河。我一个人送了4个小战士过河,腿都冻僵了。上岸后我赶快穿上棉裤,但腿已无知觉,只能由两个战士架着走。1947年底,部队到了临沭县朱村。

1948年2月,部队进攻潍县,通信营已改为警卫营。有一天,大概上午7点钟的时候,我们在城外挖好工事后,各班班长到排长处开会。因为工事比较暴露,临走时我告诉大家:特别是副班长和党小组组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敌人飞机来扔炸弹,就往后撤一点,不要待在工事里,否则可能要吃炸弹的。副班长说你放心去开会吧。我即去了排长处。才一会儿工夫,敌机来了,扔下的一个炸弹落在我班的工事里,11位同志全部牺牲。我是唯一的幸存者。革命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我永远怀念牺牲的战友们。

### 三

山东潍县米格庄为华东军区驻地,上级安排我到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同志的警卫班当战士。这个警卫班有6个战士提干了,于是从我们警卫连里挑人补充,我是其中之一。1948年12月底,淮海战役快要结束时,警卫班的武器全部换成了新的。

我们接到任务,即到印刷厂帮助印江南地图,用了大约半个月时间。

新地图要送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那里。当时杜聿明集团还被我军包围着,我们送地图的汽车要从宽阔的交通壕里通过。为了保护地图,上级安排了一个步兵连(80多个战士都配了卡宾枪)、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一共160多人,乘坐11辆车,其中4辆车装有地图,还带了汽油。行进到半路时,遇到国民党军突围,正好与我们车队相遇。我此前除了打靶,在战场上还从没有打过枪,这一回可过枪瘾了。不过打了不到10分钟,大部队就来了,有位领导对我们连长讲:“赶快撤回来,快点走,你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后来,我们把地图送到了粟裕司令部,交代完就返回了潍县。

回到潍县后,警卫部队要挑一部分战士去济南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张云逸副司令员对我说:“小侉子,你要去学习了,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就不知道了。我给你一本字典,你没有文化,这里面有文化,要好好学习。”另外,他还送我一支钢笔。这是朝夕相处的首长对我的关心。我双手接过字典和笔,顷刻间热泪盈眶,心里很是激动。后来我在临安工作时,老首长张云逸两次到杭州,我都去看望过他。

警卫部队有20多名战士一起去济南飞机场报到。教官训练很严格,我学习了3个月,获得了华东军政大学第一团政治处和教务处颁发的二等奖。接着我随解放大军南下。

1949年4月,我从浦口过长江,在南京国民党的海军司令部住了一个星期。团里很多战士都到总统府去参观。我是士兵委员会管伙食的成员,那天随司务长去接收给养,没赶上参观的机会。第二天,教导员郝鲁民领着我们三个人再去,在门口被警卫拦下。正巧一群人从里面走出来,其中有个年长的问我们怎么了,教导员说了情况。那人把手一挥,说总统府不能随便参观,回去吧。后来我遇到给陈毅当警卫员的熟人,说起这事,才知道那天遇到的人是刘伯承,他来和陈毅会面。团里组织参观中山陵,我却因为领粮食而错过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真是非常遗憾。

军大第一团从南京、无锡到上海南翔做接收、审查、遣送俘虏的工作。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的一名教授讲闽南话,我们听不懂,我让他写字与我们交流,他说你们战士很多人不识字,我说我可以字典查字。后来我们把他送回了上海交通大学。

5月下旬,军大第一团到杭州,先住在浙江大学,几天后搬到杭十四中。7月1日,我参加了庆祝“七一”的游行活动。

我们团要抽调100多名干部和战士到浙江军区第九军分区工作。大家总算结束了应急、打杂的工作状态,都高兴得不得了。

#### 四

1949年8月的一天,我们100多人从杭州出发行军到余杭,住了一个晚上。这时知道了地方上急需军队帮助的原因:当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活动猖獗,6月竟然发生了土匪围攻於潜县城、打死打伤多名工作人员的事件,土匪们在街上持枪乱放,疯狂叫嚣,威胁群众。军分区将我们100多人分配到辖区各个县去组建县大队,做巩固新政权的工作。我随大队长郑馨(浙江分水人,来自三五支队)、教导员王齐臣(河南人)等十几个人(有几位地方同志)到於潜工作。

第二天,我们走到临安、於潜交界处上东村西的一座山下,遇到一条小河,河上的木板桥被人为折断了。准备涉水过河时,我们突然听到对岸山上一群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喊,不知说什么。地方同志说,他们在骂“江北佬滚回去,你们快死了”之类的话。大队长向山上喊话:“你们不要干土匪,快下来投降,我们保证不打你们,并放你们回家。”山上却回应了一枪。由于距离远,没伤到我们。大队长说:“你们哪个人打一枪,但不要打死人,只是教训他们一下。”我说:“这距离够得着,但要不打死有难度。”大队长把他的长枪递给我(我拿的是机枪),我把枪倚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瞄准了山上一个靠在松树桩边骂得正凶的人,

枪响人倒。其他匪徒一阵乱叫，拖着被打倒的人跑了。后来有匪徒交代，那一枪正好打在他一个同伙的腿上。土匪当中都在传，江北佬厉害，个个都是神枪手。

於潜县机关被土匪破坏，暂时搬到学校办公。书记、县长见到我们很高兴，安排我们住在城隍庙的银行里。晚上，仍然可以听到有匪徒在街上大声叫骂。第二天，我们和县机关人员从中学搬回县政府院子，并加强了岗哨。几天后，二二三团的一个连到达，土匪的气焰才有所收敛，县城安全多了。南下干部被分到县府及各区单位，成立了县大队和4个区中队（潜东区、潜川区、太阳区、天目区），我到潜东区（驻地藻溪镇）区中队工作。

潜东区成立之初，只有书记孔涛、区长冯明东、农会主席高永泰和张培生，加上负责组建区中队的我，共5个人。我们借住在一户开明地主家里，但是晚上经常有匪徒来砸门。感觉不安全时，晚上我们就到镇东头桥底下睡，由一个人放哨。上级交代我们尽量不要打，多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吸收了理发店的林言、崔家的两个长工、叶盛、路仁、江西佬（外号），以及下肇村的梁长寿、梁阿德、何建章、赵一奎等多人，潜东区区中队形成建制，并有效地开展工作。

区中队成立后打开局面的第一次

战斗，发生在潜川、分水交界处的印渚埠村。一伙土匪聚集在地主家里商量对抗区政府的事，区中队劝降无效后，与我同批到於潜的辛朋交用火箭筒向土匪所在的房屋打了一炮，炮弹穿过房子，落在屋后并燃起大火，土匪们顿时被吓住了，四散奔逃。这次出击狠狠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各地的土匪都受到震慑。

有一次，我追击匪徒进了一处楼房，就是找不到人，只好退出。事后有被捕获的匪徒说，当时他们躲在楼板下的谷仓里，透过缝隙盯着在上面走动的我。其实土匪也怕我，根本不敢开枪。为了消灭土匪，我们几乎跑遍了於潜县的山山水水。

於潜境内最大的土匪头子是吕国华和唐铁英。吕国华在逃跑过程中被洪水淹死。唐铁英在荣村被发现后逃到附近的山上，军分区独立营两个连围住了此山（当时我任二连副指导员）。因二连新战士陈绍鲁的枪不慎走火，大家都冲向枪声的方位，唐和他的参谋长于是乘机逃出包围圈。他们跑到邻近的塘垆村时，被民兵发现，匪参谋长被擒，唐又侥幸逃走。但一个星期后，终于在高村落网。

剿匪战斗结束后，我奉命到浙江军区政工大队进修学习。没多久，“三反”运动开始，大家都回到原单位参加运动。后来，我去余杭公安局工作。

余杭公安局有个查禁抽鸦片的工

作。这个工作不好做,没有抓到现行不能定罪,大家不知道怎么着手。我想到在东北学做生意时曾看到掌柜的请客人抽鸦片,味道很香,屋里屋外都有。公安局的刘局长叫我带上侦查科的钱世林、叶志钦两个同志晚上出去转。有一天,我们果然闻到一户人家飘来烟香味,就用粉笔在房脚画上記号,通知其他同志来蹲守。结果我们抓了现行,搜出20多个大烟泡及一些烟具。用这个办法,一个月后,余杭城中的鸦片基本禁绝。

於潜公安队在建新营房时出了问题——建房的包工头卷款逃跑,营房造了一半没钱了。情况报到了嘉兴地区公安大队,队长、政委商量后派我去收拾局面,说老姜在於潜独立营干过,跟县委书记、县长熟悉,想办法让地方支援一下,把房子盖好。我领了任务,到於潜公安队工作。

怎么去开口要钱呢?除了安排训练,我就每天白天黑夜地坐在建房工地靠县政府门口的方向,想着能遇上什么人。结果等来了老熟人潜东区区长冯明东。听我说了情况后,他说:“这样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找县长说说。”见了梁县长,他说:“你老姜能有什么事求我,不要房不娶老婆的。”我把公安队缺钱盖房的事说了。梁县长了解情况后,通知财务科核算了费用。县委开会,决定政府出资200万元(旧币)帮公安队建房。

公安队于1954年改编,一部分转业成为民警。我回到军分区时,部队正开展肃反运动,大家在驻地城隍庙天天学习,自查自纠。我有参加日本人在东北组织的3个月军训的经历。部队派人去东北调查,最后政治保卫科给的结论是:参加军训是历史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为当时所有的适龄青年都被强制参加了军训。

1955年,我们的驻地换到杭州拱宸桥附近。没多久,每个人都收到一张请柬,上面有姓名、军衔等内容,邀请大家到省人民大会堂参加授衔仪式。我获授陆军中尉军衔。其间有文艺表演,演了京戏《铡美案》,以此教育大家做官不要忘本。后我到驻海宁硤石的浙江军区训练团三营一连任副指导员。

1957年5月,我转业到於潜县公安局任协理员。1958年12月,於潜、昌化两县合并,我带队参加新安江水库修建工作,约有半年时间。回来后,我被借调到组建中的省劳改大队,参加杭州到长兴煤矿铁路修建工程。因国家困难,铁路停建,我们转到长兴三矿修建矿区到河边的铁路。后留在当地的劳改农场工作。

1979年3月,我调回临安,担任临安知青家具厂党支部书记。1980年10月到1981年12月,我担任临安县电扇厂党支部副书记。后调到县民政局工作,直到1984年离休。



我今年97岁了,见证了旧中国的苦难,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见证了临安建立人民政权的艰辛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这代人大部分都不在了,我的经历也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沧海一粟。在革命队伍里,我是一名党领导下的普通战士。我坚守一个普通党员的信仰,坚持学习,认真阅读党

报党刊,按时参加老干部局组织的每月一次的学习活动。不及时学习,就跟不上形势发展。我坚定拥护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支持区委、区政府的工作。总之,我要活到老、学到老,跟着新时代的步伐继续前进。

(资料原载于《初心如磐:临安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



## 永远是战士

采访对象：刘学德，1925年出生，山东省滕县人。1944年12月参加新四军，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长、副连长、指导员等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长期在部队医院工作，曾任解放军112医院副院长，1977年转业到临安工作。

### 一

1925年2月，我出生于山东省滕县孙庄，我家世代务农。家里原有3亩地，因为产量太低，后来租了地主家10亩多地，但粮食大半归地主，全家勉强能吃饱饭。后来孙庄被洪水冲毁，我住到了大彦镇宋王楼村姑姑家，这个村只有八九户，家家都是佃户。我7岁起先后在蒋河沿村、董家庄读过一段时间小学，平时在家割草、锄草、喂牛。

为了奴化中国人，日本鬼子让中国人学习日语，每个村都有参加日语培训班的人数指标。我父亲因为欠了日本鬼子指派的捐税而被抓，村长就要我去受训，说如果我去了，捐税可以减少。1940年2—4月，我在级索街参加日语培训班的学习，学了一些简单

的常用日语。教师有时是日本人，有时是中国人，说学了日语，日本人去村里时方便联络。培训班不仅教日语，还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并要求我们向日本人行礼，经过岗楼时也要敬礼。

这个培训班的学生有30多人，年龄大小不等，大的有20多岁。有个学生会摔跤，曾把一个日本鬼子给摔倒了。鬼子找他报复，那名同学只好自动倒地，鬼子却直接坐到他身上痛打。他被打得好几天吃不下饭。老百姓非常痛恨日本人，骂那些加入伪新民会的人是汉奸，都说日本是在侵略中国，但中国人多，日本不可能胜利。为了不被日本人骚扰，妇女脸上抹灰，披头散发，穿破烂衣服。

1940年6月，我到国民党山东省第一专区保安十四旅当兵。当时，一个远亲表哥和一个姓韩的人从十四旅请假回家来，我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说还不错，有饭吃，让我跟他们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我招去是有赏钱的。我在家里没事情做，再过下去也没意义，就想着去当兵。十四旅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旅长化名周全，真名叫李同周，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到上

海文联工作。我有一支老套筒枪,但没有参加过与日本鬼子的战斗。1944年10月起,我在国民党七十五师警卫二营当了约两个月的上等兵。1944年12月,我成为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一营的一名战士。

当时,我和滕州的王泰原商量好去投奔新四军。王泰原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情况了解很多。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有出路,你敢不敢?”我说:“你上天我也跟着上天。”于是当天晚上8点,我们俩空手行动了。因为带武器跑罪过大,被抓到要被枪毙。过了涡河,看到有新四军岗哨,王泰原就对他们讲了 we 想投奔新四军的事。然后,有人把我们领到了机枪连。连长叫杨惠山,看起来有文化,王泰原对连长说了实际情况。连长看我们很诚实,是穷苦人出身,热情地问:“吃过晚饭没有?”我们说:“吃过了。”连长当时就说他相信我们说的话,并把 we 安排在了连部,让我们不要出去,他到营部汇报此事。我们心里踏实了,说了一宿的话。营部来的人找我们谈话,说:“到了新四军部队,就是到自己家了!”就这样,我们正式参加了新四军。机枪连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大约20人。

## 二

到新四军部队的第二个月,我就参加了在津浦路东和二鬼子(伪军)的战斗。皖北、苏北多为平原地带,攻打

城市和据点没有炸药是不行的,不能强攻。日本人在铁路两边设有据点或炮楼,以保护铁路和日军驻地。通常是三个据点一个炮楼,有一个小围墙,据点人数最多的有200多个鬼子和伪军。我们部队佯攻一座炮楼,将其包围起来,等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增援时再打伏击战。我在战斗中曾两次把手榴弹投进炮楼的射击孔里。我们还把手榴弹挂在杆子上,捅到围墙里面去。打了几仗后,日本鬼子似乎熟悉了我们的战术特点,不敢出来增援了。

起初参加战斗,我也害怕过。不过,在老战士的带领下,我经过几次战斗锻炼就不再害怕了。越怕死越没有战斗力,而且我们是在打击侵略者,牺牲了也是死得其所。当然,和日本鬼子面对面战斗,我方伤亡也很大。战斗中要讲机动灵活的战术,尽量避免和减少伤亡。

刚参加新四军时,我以为部队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的人就应该都是共产党员。连长说不对,入党要先写申请,符合条件的战士才能入党。我们班里有3名共产党员,行军前,他们商量如何巩固队伍(防止出现逃兵),防止非战斗减员,还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注意影响,遵守纪律。行军中,他们要替其他战士背东西。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国民党军队中是看不到的。他们3人在班里真正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对我影响很大,我

决心向他们学习。

1946年2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一位班长、一位排长,姓名记不清了。王泰原对我说:“共产党有发展前途,别看现在力量还不很大,要看长远。共产党有希望,整个部队和革命胜利都有希望。”我相信王泰原的话。他在1946年底的宿北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我在新四军六师十七团任学员、班长。在1946年10月苏北陆塘河打国民党第七军(广西军)时,我头顶受伤。当时感觉头顶像被蚂蚁咬一样,我用手一摸有血,才知头皮受伤了。

我当班长时起初表现不错,因班里没有出现逃兵而受到营部大会表扬。我最担心的就是出现逃兵。因为生活艰苦和战斗的危险性,有一个班曾出现两个逃兵。

不过,后来班里出现了逃兵事件。一个因违反纪律被撤销班长职务的战士,还有一个逃兵回家后被送回部队,都由上级安排到了我班里。有一天晚上连队点名、连长首长讲话后,这两个士兵说到炊事班弄热水泡脚。因为经常长途行军,部队非常关心战士用热水洗脚。结果,那两个去抬水的人很久都没回。班里外号叫“小黑子”的小战士向我汇报,那两个人抬水没回来,抬水的工具都还在。我让“小黑子”赶紧向连里汇报,自己和另外两个战士去

找,却一直没发现他们的踪影。营部说,一个班出现两个逃兵,班长该辞职。第二天指导员找我,了解我的情绪。我说不想当班长了,太难干。他说:“这两个兵你也不能拴在裤腰带上。你工作做到位了,大家都承认,‘小黑子’很关心你。”指导员告诉我不要背思想包袱,好好干,营领导讲的话是吓唬我的。于是我继续当班长。团里的保卫干事到我班里调查,看看有没有政治问题,调查后没发现问题。所以,在艰苦的战地条件下巩固好部队非常重要。

孟良崮战役是在1947年5月打响的,我们二纵担负阻援任务,我担任六师十七团一营一连三排副排长。团山以北都是山岭,我部准备组织一个网,把敌人引向北边包围圈。毛主席主张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打歼灭战。

头天晚上有月亮,我们去察看地形,敌人的炮兵阵地都看得见。班里战士在老百姓的萝卜地里挖战壕,我说不能挖,否则违反群众纪律。连长宣布:“昨天三营守住了阵地,打了8次反冲锋,我们一营要打18次反冲锋,因为我们是一营。”我当时就想,3个连在这么小的山头上防守,敌人重兵进攻,我部肯定损失很大,于是向上级反映了我的意见,但没有被接受。

第二天敌人很猖狂,地面炮火进攻非常猛烈,天上还有敌机凶猛的扫

射。我对战士讲,不要惊慌乱动,保持战斗队形,越乱伤亡越大。战斗十分激烈,战士们非常英勇。营长朱振个人英雄主义很强,本来上级命令打到10点钟,他却下令继续打,结果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一连只剩下7个人,其他都负伤或牺牲了。连长王德胜拔出手枪要自杀,通信员拦住了他。机炮连的4挺重机枪丢失了3挺半,马克沁机枪都丢光了。三连的伤亡也很大。打到12点时,我们才撤退。二连在山后做预备队,没参加战斗。

我听到空中炸弹飞来的声音,赶紧侧身藏在壕沟里。结果空中爆炸的弹片进入左大腿,进去一个洞,出来两个洞。我一摸腿还在,只是麻木了,副班长立即拿包扎带给我包扎。我如果不及时卧倒,就会伤到胸部或头部,可能就牺牲了。连部包扎所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有两名卫生员。身材魁梧的机枪手李明强(广东人)把我背到包扎所。战士们有伤不说痛,轻伤不下火线。战后,部队把缴获的敌人平底鞋奖励给了我一双。

淮海战役时,我们的连长、副连长都牺牲了。指导员向营部汇报后让我当副连长。我怕指挥不好,战士负伤、牺牲多,责任大。指导员立即说:“不要有压力,我相信你的能力。”我是三排长,一排长、二排长资历都比我老,不知为何让我当副连长。我带三排战士夺回了原来十一纵某部失守的阵

地,这个阵地在徐州附近一个叫李庄的地方。夺回阵地后,我连休整三天。我向指导员反映不想当副连长,还是继续当三排排长为好,指导员没同意。下午书面任命就来了。

离休后,老干部局组织我们去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面有关于李庄战斗的照片。我对讲解员说,我是亲自参加了李庄战斗的。讲解员又吃惊又高兴,亲切地说:“老爷爷,请您来讲一下李庄战斗的经过,您会讲得比我更精彩!”我根据记忆,愉快地介绍了一遍。

### 三

1949年初,华东野战军二纵六师十七团改为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1—9月,我先后任一八八团一营机枪连副连长、指导员,参加了渡江战役。二十一军主要担负突破对面贵池至大通段江防任务,六十一师在左,六十三师在右,六十二师是预备队。听说对面是刘汝明的部队,战斗力不强。

1949年4月20日晚,一八七、一八九团占领了木排洲(江心洲)。敌人不多,我军一登陆,他们就跑掉了。当晚,我随渡江部队进入木排洲,为第二天过长江做准备。我们的船行至木排洲北面。担任突击任务的是一八八团和一八九团。21日晚,信号弹一打,我们就开始冲击。



我带了两门六〇炮、一挺重机枪，配属突击连一连。一连一排负责佯攻。在总攻信号弹还没打出时，一排已经坐船到对岸了。听到枪炮声响，我在想，是一排打过去了，还是江南游击队在南边配合我们渡江？结果，一排只剩两个战士，我过江时见到了他们。一个是被国民党军俘虏后偷跑出来，守在南岸边；另一个是机枪手，他提着机枪往江里跑，江水没到了脖子，敌人用手电筒照，他没被发现，就在江里等待。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同样是用烈士的鲜血铸就的。

我们炮兵立了集体二等功。根据地图和观测，4门六〇炮（其中两门是一连的）猛轰对岸敌军的火力点。被俘的敌人说，我们的炮弹密集得像下雨一样，无处躲闪。岸上敌人留下的炮弹很多，机枪连的人留下一半捡炮弹。部队进入南岸后勇猛前进，迅速占领青阳等地，胜利完成渡江战役。

渡江后，我们从青阳经过泾县茂林、宁国到浙江的孝丰。二十一军急行军赶往杭州，要保护好钱塘江大桥。5月3日，六十一师一八五团二营以最快的速度攻下了钱塘江大桥。如果再迟到一个小时，钱塘江大桥就危险了。他们保住了大桥。

5月3日晚上，我们住在六公园。商铺中的人都跑了，架子上没有东西，我们就睡在空房子里。第二天上午休息，下午我们在钱塘江大桥下上船，过

江后到了临浦。侦察发现有国民党部队大约一个团。机枪连在一个庙里布置机枪位，由于菩萨像影响射击，战士们就把泥菩萨搬走了。第二天，敌人逃跑了一部分，我们向余下的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解放军优待俘虏。”无路可退的敌人只得投降。降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萧山人，被补充到部队里去，后来大部分都跑了。萧山人说：“萧山兵是有名的烟筒兵，看不到自己的烟筒要流泪的，离不开家。”

我们在萧山临浦火车站上了一列闷罐子车，军政治委员康志强和我们一起上车。到金华下车后，我们步行到丽水，再到温州。我们把缴获的武器装备和俘虏都交给了浙南游击纵队。听说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是龙跃。

温州解放后，一八七团留守温州。师参谋长李光军带一八八团和一八九团进军福建，解放了福鼎、霞浦、柘荣、罗源、宁德等地。在罗源碰到了“还乡团”，我们一发起攻击，“还乡团”就投降了。从浙江到福建的山路很难走，天气又很热。在福鼎，我们得知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了。我作为一名从旧军队走过来的解放军战士，我也有一种自己从此完全解放了的感觉。

部队本来要去福州，但上级命令我们在宁德休整，组织干部到海边察

看地形。这时有命令说十兵团到了，让我们暂时驻在宁德。在宁德驻了一个多月，一座岛上的老百姓反映山上有土匪。土匪和渔民混在一起，不容易区分，实际上这些人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部队去了一个加强营。船还没有靠岸，就见敌人拿着灯在岸边喊：“不要打，我们投降。”但是，部队到岸边下船时，敌人的轻机枪、手榴弹却马上打了过来。战士们一下船即展开英勇反击，敌人逃到了山上。因为山高草长，小洞很多，清剿残敌花了不少时间。我没有参加这次战斗。

1977年，我转业到临安粮食局工作，后担任过临安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这些工作我并不熟悉，我先认真了解情况，业务熟悉了，再开展工作。粮食、商业、供销都很复杂，我跑遍每个基层单位，干工作的首要条件是了解实际情况。

回顾我这一生，我有诸多感慨。我曾经是一名人民军队的战士，战士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我的妻子、儿子也都曾经是军人，我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事业做贡献，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我们要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

（资料原载于《初心如磐：临安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



## 侯头之战纪念碑

侯头之战纪念碑位于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白果村,现为杭州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4年7月,为缓解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红七军团被抽调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区挺进。12月1日,部队到达昌化地区,次日在清凉峰侯

头与追击的国民党部队遭遇并发生激战。是役,毙伤敌人50余人,击毁汽车一辆;18位红军战士英勇捐躯,长眠于此。

1996年,临安市政府在原战地建造纪念碑,取名“侯头之战纪念碑”,纪念碑正面刻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侯头之战纪念碑”。



侯头之战纪念碑

## 来学照烈士纪念碑

来学照烈士纪念碑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庆北村。

来学照烈士是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庆南村人,1925年初在河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开封市委负责人、共青团河南省省委常委、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在开封时,他以“泉官银局”“两河书店”职员身份为掩护,领导工人和革命师生进行英勇不屈斗争。1931年1月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铁骨铮铮,坚贞不

屈,视死如归,表现出了革命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同年3月25日被敌人秘密杀害,年仅27岁。

1987年3月,临安县政府在横畈庆北村的田螺山上建立烈士纪念碑,同年12月28日落成。纪念碑分碑座、碑身两部分,碑座正面黑色大理石板上镌刻了烈士生平和主要革命事迹,碑身上刻有“来学照烈士永垂不朽”九字。



来学照烈士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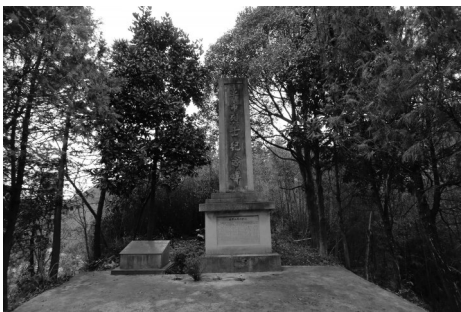
## 林岩生烈士墓

林岩生烈士墓位于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横路村,现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林岩生,1903年出生在浙江青田,1926年随叔父来到於潜横路,以理发为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村支部书记,他积极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展党的组织。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暴露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真面目,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到处抓捕共产党员。是年3月,国民党於潜县“抗日”运动委员会来横路抓捕共产党员陈长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危难时刻,林岩生挺身而出,机智地与敌人

周旋,掩护陈长林转移,使敌人两处扑空,敌人恼羞成怒,逮捕了林岩生同志。敌人对他软硬兼施,逼他交出陈长林和横路地下党名单,在敌人威逼利诱下,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以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保守党的机密,最后在敌人的严刑折磨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林岩生烈士牺牲后,当地群众将他安葬在横路武村,1986年迁葬于此。1988年,原横路乡政府重修并立碑纪念,纪念碑高2米多,正面直书:革命烈士纪念碑,底座上面书写林岩生烈士生平事迹碑记。



林岩生烈士纪念碑



林岩生烈士墓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龙井桥革命烈士纪念碑

龙井桥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龙井桥龙黄岭上,现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龙井桥地区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该地依靠广大群众进行英勇斗争,逐步建立起16个党的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在各村建立工农分会,入会群众200余人,还建立了宁昌游击队等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攻打昌化县城,惩治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遭来

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桂贤火、姜水祥、汤母生、卢水根等一批革命骨干被杀害,龙井桥地区的革命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1971年9月,中共龙井桥公社委员会将分散各处的烈士遗骸迁葬于龙井桥龙黄岭,并立碑纪念,1976年重建。纪念碑正面右上角直书:革命烈士桂贤火、姜水祥、汤母生、卢水根、徐根贵、何有为、邵水根七位革命烈士姓名,碑正中间书有:“永垂不朽!”背面草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龙井桥革命烈士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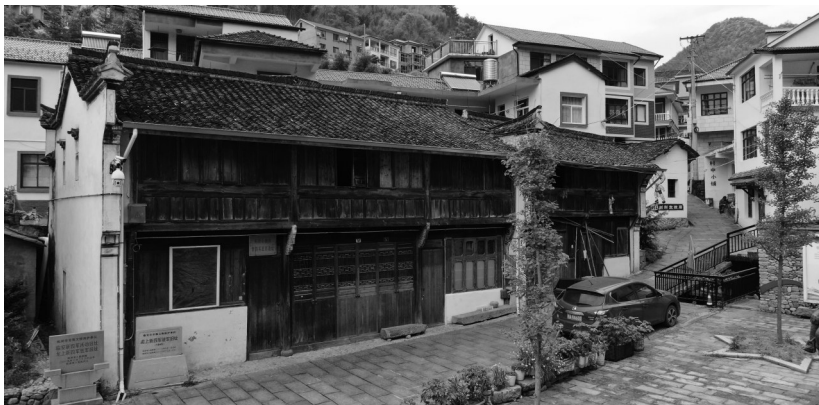


## 龙上新四军驻军旧址

龙上新四军驻军旧址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龙上村,现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5年1月,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部队。3月,占领临安县境内

的石门、高虹、横畈、山川、青云等地。在天目山反顽战役期间,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高虹龙上、石门一带驻扎,开荒种地,设立被服厂、救护站、军粮仓等,在当地留下了一道道红色印记。



龙上新四军驻军旧址



龙上新四军驻军旧址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民族日报社旧址

民族日报社旧址位于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后渚村(原鹤村121号),原为何家祠堂,清代建筑,坐北朝南,面积300平方米。四合院式,前后两进,青石构筑天井。现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级党史教育基地。

《民族日报》是中共浙江地下党于1938年11月在金华筹备,次年元月5日在於潜鹤村创刊的一份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日报,创刊誓言是“用文化特有武器,配合政治进攻,粉碎敌(日)伪文化侵略”。

《民族日报》虽由国民党浙西行署主办,早期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浙西进行抗战宣传的主阵地。日发行量从初期的3000份,最高达到9000份,

影响力遍及浙、苏、沪、皖、赣、桂等地。

报社建有中共民族日报社特别支部,中共浙西特委也短暂迁驻于此。报社先后有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新闻工作者惨遭敌人杀害。

1988年,临安县人民政府将民族日报社旧址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民族日报社旧址



民族日报社旧址为浙江省省级文保单位



《民族日报》创始人王闻识烈士塑像

## 藻溪革命烈士纪念碑

藻溪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藻溪村独山头。现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临安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5年6月26日,新四军驻青云某部30余人,在驻西天目友军百余人配合下,与盘踞在藻溪的忠义救国军300余人发生激战。历时近6小时,重创敌军。是役,7位新四军战士血洒藻溪,当地群众将其安葬在梅树山下。

1966年,当地群众将烈士墓从梅树山下迁移到独山顶。1995年,当地政府对墓地进行了扩建和修缮。2005年再次进行扩建,建有门楼,门楼两边上书写:“新四军歼顽匪威震潜东,七战士洒热血长眠独山”,背面上书:“烈士精神,万古长青”,两边记有烈士墓修建过程及战斗经过。纪念碑中间书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印刻毛主席的“死难烈士万岁!”。



藻溪革命烈士纪念碑



## 赵尔春烈士纪念馆(纪念碑)

赵尔春烈士纪念馆(纪念碑)位于杭州市临安区潜川镇麻车埠村。现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杭州市党史教育基地、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赵尔春是潜川镇麻车埠村人,1960年9月参军,在部队不仅刻苦学习各项军事技术,而且始终服从组织工作调动,先后干过电工、雷达技工、通讯站载波兵和电话守机员,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干一行爱一行。196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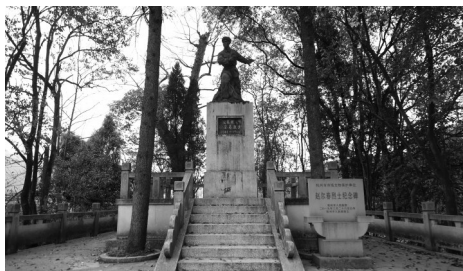
1963年12月27日晚上,温州上岸街失火,正在看电影的赵尔春闻讯,立即和战友们一起冲出电影院,朝火光通红的方向飞奔而去。在救火过程中,赵尔春被砖瓦椽梁压倒,生命垂危。经抢救无效,于1964年1月3日凌晨2时牺牲。赵尔春牺牲后,温州市党政机关、部队、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各界群众6000多人怀着无比的悲痛在市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大

会。海军东海舰队授予赵尔春“雷锋式的五好战士”荣誉称号,并给他追记一等功。海军政治部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荣誉称号。1964年3月27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赵尔春烈士“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并命名赵尔春生前所在班为“赵尔春班”。同年4月16日在上海举行命名表彰大会,号召大家学习赵尔春的伟大革命精神。

1971年4月,中共临安县县委、县政府在麻车埠村桥头馒头山上建立了“赵尔春烈士纪念碑”及烈士全身塑像。1985年,临安县政府在紫水小学校园内修建了“赵尔春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坐北朝南,占地150余平方米,馆内藏有赵尔春烈士救火时穿的军裤、背心、军帽等遗物,张爱萍将军题词:“继承烈士遗志,再创英雄业迹”,当年报道赵尔春烈士先进事迹的报纸和图书,以及各级领导参观的照片、题词等。



赵尔春烈士纪念馆



赵尔春烈士纪念碑



## 周恩来演讲旧址

周恩来演讲旧址位于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禅源寺内,现为杭州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争取国民党中间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3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抵达金华视察东南抗日前线,准备与民国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谈,共商团结抗战事宜。得知黄绍竑在西天目山主持浙西行署第一次行政会议,周恩来一行转道兰溪、建德、淳安、分水,于3月21日到达於潜县城,在国民党於潜县党部与黄绍竑进行了第一次会谈。翌日,周、黄二人抵达天目山。

24日上午,周恩来应邀出席浙西临时中学在禅源寺百子堂补办的开学典礼,学校全体师生、浙西行署全体成员、行署干部训练班学员等共1500余人参加。演讲中,周恩来首先肯定了浙江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进步,认为浙江一切的进步,“不要说在前线取得了领导的地位,就是在后方各省来说,也应该把浙江当作模范。”接着从7个方面分析了取得进步

的原因。最后,周恩来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4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今后浙江抗战方针,号召广大人民“共同向政治进攻的前途迈进,共同负起政治进攻的责任来,收复我们的杭嘉湖,保卫我们的大浙江,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完成这历史上的伟业。”演讲铿锵有力、条理分明、分析有据,富有感染力,赢得了现场听众久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

1989年,为纪念周恩来西天目山之行50周年,临安县县委、县政府建造了“周恩来西天目之行纪念亭”,亭内立有双面磨光大理石碑一块,碑正面刻有著名美术大师刘开渠题写的“周恩来演讲旧址”,背面刻有碑记。浙江省委原书记铁瑛、原省长薛驹为纪念碑揭幕。2009年,为全面复建禅源寺,将周恩来演讲纪念亭择址重建于寺内,亭正中央立有原旧址纪念碑。



周恩来演讲旧址

## 邹子侃烈士墓

邹子侃烈士墓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新溪桥村烈士陵园，现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11年，邹子侃出生在临安区锦城街道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家庭。1925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邹子侃接到上级指示，转入地下活动。他利用公开合法身份，教农民识字，向农民宣传爱国思想，组织农民运动。1927年11月10日，遭到国民党逮捕，囚禁于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坚持斗争，并担任狱中中共特别支部书记。1931年，狱

中中共特别支部计划组织难友越狱，他又兼任越狱暴动总指挥。因叛徒告密事泄，危及难友，他当机立断，机智报警，保护狱友脱险。1932年2月2日深夜，邹子侃英勇就义于狱中，时年21岁。牺牲后，遗体由亲人收回安葬在原临天乡稻桶山南坡上。

1982年，临安县政府将烈士墓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12月28日，临安县政府重建烈士墓于城区长桥北端山坡。2017年，因杭临城际铁路建设需要，将烈士墓迁至现址。2019年，杭州市政府将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邹子侃烈士墓



邹子侃烈士墓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1967,大旱之年的乡村

杨菊三

缘着时光长河回溯的那会儿,我将年份掐在了1967的大旱之年。

那可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后来的县志、乡籍都有实录。但对于它的细枝末节,还真的只能在乡野中找到一鳞半爪。

其时我15岁,刚刚完成了高小学业,因“文革”,回乡务农,已经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社小社员了。

自7月中旬开始,老天就没正儿八经地下过雨。溪里的水干涸了,地中的苗燥渴了,庄稼蜷曲着身子,草木耷拉着脑袋,就是平常神气十足的翠竹,此时也面黄肌瘦地半枯焦了。

由于干旱,我家门前菜园地里的黄瓜、茄子、辣椒、刀豆们,早已挺不直腰身;邻居原本在草棚上爬了半截子的冬瓜,此时也散了架,成了一摊枯藤。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村里唯一的那口水井,自从爷爷的爷爷传下来都不见露过底的,现在可以翻过来当帽子戴了,只剩下几滴泪水似的在那里冒泡泡。白天水满溢不出来,只能在夜晚候在那里等着稀罕的一瓢半瓢清泉。

河床断了流,换来的是一溪的鱼腥味。好容易还有一个镢子潭尚留半

池水,我们几个毛头小伙子勉强可以去那里洗洗澡,活活血,将一身的暑气消释掉,也借此舒展舒展筋骨,运作运作气力。

稻禾渴盼着水,庄稼渴盼着水,生活渴盼着水,可是看看天上,总是见不着一朵下雨的云。为了将晚稻栽种下去,各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妙招,有的用水车从堰潭中将水引进田畈,有的还在留有些许潮气的溪中挖井引流,有的用竹杆把水从远处接入。我们四个同年佬,此时也被生产队长派上了用场,让我们到尚堰上车水,每天要将堰下的那潭水车干。一日要车一潭水,而且是从低低的堰下车到高高的堰上,这可不是唱戏文,可以张口就来的。它需要的是重量级的长条水车,还得是三个轮式的那种。我们四个人由三人车水,另一个做后勤服务工作,比如护护临时做成的拦坝啦,修修脱节的水车肚肠啦,要回家去灌灌已喝完的凉茶啦……相互轮换,有序推进。

这一潭水,真不好对付啊。但我们鼓足一股气,狠命地用心力用巧力。汗水滴成了流星雨,衣衫在干干湿湿中结成了盐霜;双脚踩出了紫血泡,腿肚在松肿胀胀中暴突起青筋。我们从

早晨七时许开始,一直不停歇地干,也要到下午四时左右才得以大功告成。第二天我们到了那里时,堰下的水又恢复了原状,我们重新投入战斗,如此周而复始,一直干了一个多月,直到旱情解除为止。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这年旱情到来之前,生产队里秧苗突然不够了。这在往年,只要到周边生产队里调剂调剂就成了,可是问了周边的所有生产队,都囊中空空,没有一个有富余的,只得派人到新登那边去买。派去的那两位社员穿村走户跑田畈,好不容易买到了所需的矮脚南特秧苗,时令推迟了大半个月,待栽上种下时,其它的稻苗早已返青,看来要有收成,还是凶多吉少。

在奋斗了一个夏天后,常规田里的水稻终于统统种上了,而那些后来改出来的“靠天田”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有的种玉米,有的栽黄豆,有的撒播其它的旱地作物。

谁也不曾想到,那些种在旱地上的黄豆长得特好,一阵轻风吹过,枝摇叶动,而且豆荚特别密集,特别饱满,成了少有的丰收年;而那些与季节脱了大半个月的矮脚南特,也出落得十分喜人,虽则稻秆矮得有点貌不惊人,

可稻穗尺度长,颗粒壮,挤挤挨挨的铺天盖地,犹如一张可以在其上行走的黄金毯,比我们生产队平时在种的当家品种还显得出挑。这大概是从广州过来的稻种,颇适宜大旱中近乎热带的光照之故吧。不过丰收是丰收了,还嫌栽得少了点,不然全部选用这一品种,跨过“纲要”保险没有问题。最不受待见的却是玉米。按理说,玉米种在田里比栽在山上不知道优越多少倍,但它不争气啊,结出来的苞谷却是畏头缩脑的,既僵硬又散漫,不知是种子退化变异呢,还是大旱之年的意外遭际。

1967年的旱灾,是我遇到的最疯狂最具影响力的灾情,尽管那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电器设备稀缺,生产条件落后,但那时人定胜天的意识强盛,奋发图强的信念高昂,没有一人喊苦叫累的,没有一位唉声叹气的,胸中自是装着马达,双脚自是大步流星,目的为着抗击灾害,为着脱贫致富,更是为着奔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故而不惧不怕,严阵以待……

(作者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 永远的井冈山

陈利生

这是一个永远牵动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地方,这是灵魂的朝圣地。

我相信,去井冈山的游人不只是赏景,也是为了缅怀,为了纪念,为了用心去体会那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抵达井冈山已夜幕时分。急风掠过,松涛翻滚,似千军万马迎面扑来,内心激起了一股异样的波澜。迎着冰冷的晚风,我想:这就是那片伟人们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么?有多少个日暮时分,那位远去的湘江诗人,站在这里静静思考?抑或诗兴大发,以他的雄才韬略书写着剑与火的史诗?

披着微醺的晨光,我们走进了井冈山的腹地。放眼四望,山峦叠翠,竹浪翻腾,如同进入了一片浩瀚的绿色海洋,心头好不惬意!

八百里罗霄五百里井冈山脉,被深秋的一层耀眼金色静静地笼罩着。这里,红的是历史,绿的是山水。

那也是一个深秋的季节,一群衣衫褴褛、大刀梭镖的队伍,以红米饭、南瓜汤、野菜糠喂养革命,那山头飘荡的缕缕炊烟便是毛泽东点燃的星星之火……

1928年4月,伟人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双巨手在这里深情一握,一座原

本名不见经传的深山遂走进绵长的青史,走进世人由衷的向往与敬仰中。

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来说,井冈山无疑是胜利的起点。而起点往往是最艰难最险恶的。

小井红军医院是最让人心悸的地方。当走进医院,看着这阴暗潮湿的低矮房间,席地而铺的简陋病床,这缺医少药的山区乡野,要承担万余红军的健康重任,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我们的红军更是靠智慧和毅力战胜了一个个困难。红军医院不知挽救了多少伤病员的生命,也见证了无数个年轻鲜活生命的消逝。

站在那黑色的仿佛被烈士鲜血浸染过的杉木楼房,似乎还能隐隐听到伤病员的呻吟声。那孤寂痛苦中的呻吟,更让这座埋于竹海中的医院陡添一份苍凉。

离医院不远的,是红军坟。当年,敌人突袭到小井,架起了机枪进行疯狂的扫射,130多名红军全部壮烈牺牲。90余年的丰功伟绩,如今的一抔黄土,对于我们这些游客来说,是再难铸造的丰碑。

巍峨的五指峰可以作证,井冈的红杜鹃可以作证,大小五井可以作证,



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可以作证。

你看，井冈山北岩峰那高大雄伟的纪念碑，似燎原之火，像钢枪利剑，直插云霄。今天，在这里虽听不到连天的炮火，闻不到弥漫的硝烟，可我分明看到了那些走动着的朦胧的高大身影，他们未曾离去，还聚集在井冈山上，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离开小井医院，我们就到了大井——毛主席的另一处故居“白屋”。当年毛泽东就和红军战士住在一个院子里。第三次反“会剿”中，大小五井被敌人烧成一堆瓦砾，旧居仅存一堵残墙。毛主席旧居后面，有两棵树，一棵是南方红豆杉，一棵是椴木石楠，当年两株古树也被烧枯。20年后，全国解放，旧居得以修复，劫后余生的残墙被村民巧妙地镶嵌进墙体，两棵枯树竟也和新中国一起奇迹般地发芽吐叶。据介绍，大树也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三枯三荣，颇为传奇，让人不禁感叹大树之灵性。其实，历史的巧合并不需要人们的刻意而为，那些长眠在地下的烈士的英魂和这里的一草一木，它们的生命是不息的。

我抚摸着“朱毛”故居里那布满弹洞的残垣，内心一阵激动。想当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这里。那时，四周树木郁郁葱葱，这两棵树尤其可人。门前的两株古树曾为领袖们撑起一片绿荫。

黄洋界于井冈山，如长城之于北京，漓江之于桂林，几乎每个到井冈山的人都会去黄洋界，这个当年因一发炮弹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山间军事哨口，早就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浓重而神秘的一笔。

登上海拔1343米高的黄洋界垭口，举目远眺，群山起伏云雾弥漫，乱云飞渡飘忽不定，顿生万丈豪情！一段残存的红军战壕赫然出现在眼前，把我的思绪一下拉回到90多年前的战火中。如今，英雄不再，炮声不再，空留一方炮台镇守着群山和云雾。徜徉于此，心潮激荡。感慨之余，用手去抚摸那饱经沧桑的大炮，感受一下当年的火热。耳边似乎又听到了那不朽的诗篇：“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是的，你看黄洋界那起伏的群山，那绵延的波谷浪峰，那是从湘江边就开始烂熟于心的磅礴的诗意。毛泽东这位马背诗人，从井冈山到娄山关，再到延安到北京，他用诗作吟唱着艰苦卓绝的苍茫岁月。

离黄洋界不远处，有一条羊肠小道在那起伏的群山脚下绕悬崖而上，这是当年毛泽东、朱德和红军战士挑粮走过的小道。路边的那棵小荷树如今已经长大，只是不见往昔挑粮之人……朱德的青竹扁担，挑的不止是粮食，更是革命的重担，人民的前途！

当我随着人流站在井冈山革命历

史博物馆内,看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看到一张张后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像,看到一件件先烈们留下的遗物……瞻仰着烈士遗照上一副副年轻英气的容颜,还流淌着孩子般的稚气。他们都牺牲在生命最灿烂的年华,他们把鲜血挥洒得那么精彩而灿烂,将青春化作了井冈山上一簇簇映山红,永远地融入了大山!

巍巍井冈山,在你的怀抱,我不停地追寻着那些逝去的时光,还有那些不曾磨灭的足迹——

90多年前,在茅坪的八角楼上,如豆的灯光下,肃杀的寒气中,一个披着旧棉大衣的瘦高身影,在这间给人灵感的山间斗室里思考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应运而生。

我听到了——飘荡在龙江书院上空那会师的欢声笑语;我看到了——

八角楼的灯光依然闪亮;我感受到了——红军造币厂里熊熊燃烧的炉火在呼呼作响……

岁月流逝,群山依旧,井冈山已成为一个象征。井冈山作为朱老总题写的“天下第一山”,尽管在中国版图上弹丸之地,但在中国人民心中却高耸云天。

我想,是毛泽东使井冈山更美丽,是毛泽东思想使井冈山更伟大。

井冈山,这座中国革命永远的丰碑,她不仅诠释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是镶嵌在中华民族整体记忆中一个金光闪耀的亮点……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回眸井冈的千仞石壁,似热血在铁青如削的峭壁上流淌。那就是燃烧着的火红的信念!

(作者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临安区作家协会主席)



## 区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 开展“七一”慰问困难老党员活动

浓浓组织情,温暖党员心。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营造党组织关爱生活困难党员群众的良好氛围,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困难党员的心坎上,6月29日,区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许月琴带队前往青山湖街道,走访慰问困难老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及亲切的问候。

在慰问活动中,党史研究室一行3人和所在村干部一起,先后到庆南村困难党员陈方兴和庆北村困难党员王锦城家中,亲切地和老党员们拉起了

家常,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安心生活,还为老党员送上了慰问金。雪中送炭的慰问和关怀,让这些生活困难的老党员感动不已,他们连声道谢党的关怀,并表示要时刻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在传承优良作风、推动家乡建设中发挥余热。

通过此次走访慰问,让困难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使他们生活上得到帮扶、精神上得到激励,更加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 区委党史研究室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会

日前,区委党史研究室结合开展7月固定主题党日活动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会,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许月琴主持会议,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党史研究室主任方英儿同志传达了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辅导讲座以及临安区委十四届十三次全会报告《坚决扛起责任 坚定争先创优 争当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相关精神。他指出,我们党史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思想高度、理论深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党史研究,当好红色根脉的守护者,立心铸魂的引领者,党史研究的耕耘者,正确党史观的践行者,在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中贡献临安史志力量。

许月琴同志用“一个主题”“四个伟大成就”“五个庄严宣告”“建党精神”“九个必须”等几个关键词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大家交流了学习体会。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深刻总结和阐述了党的百年奋斗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提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要求和行动指南。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矢志复兴,接续奋斗,立足本职,从自己做起,从现实做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三级调研员王飞熊同志结合工作实际谈了自己对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体会,深深感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也是来之不易,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建党百年为契机,系统学习党史,尤其是我们作为党史工作者,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宣传发动,造浓党史学习氛围,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他与会的党员同志也分别进行

了交流发言。会上还评选了二季度党员服务之星,全体党员缴纳了党费。七月份指定学习材料上传到室党支部微信群进行自学。此外,还组织全体机关党员干部集中观看建党百年重磅献礼电影《红船》。



## 区委党史研究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8月25日,区委党史研究室结合开展8月固定主题党日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许月琴主持会议,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围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党史研究室工作职能,室主任方英儿指出,要巩固好运用好固定主题党日活动,做好灵活性、专业性和实效性的文章,同时对做好新时代党史工作的基本目标、工作方向、主要举措进行了阐述。要通过原原本本的学习,广泛的走访调研,活泼的交流发言,丰富学习形式;要坚持“一突出、两跟进”(突出新时代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这个重点,跟进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以及地方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的实践,跟进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的丰富发展,记录好新时代党的历史新篇章),着力打造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高端品牌,注重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功用。

副主任许月琴带领大家一起学习8月固定主题党日活动学习内容:《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以及远程教育必修课等,并将学习资料上传到室党支部微信群供大家自学。同时,对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每位党员做到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聚焦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主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撰写一篇学习体会,在举行专题研讨会时进行交流发言。